



第 31 期（总 31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 目 录

### ■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举行 2016 新年教育论坛	4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让青年成为数字丝路的主力军	6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中北大获奖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	8
“乘爱之翼，济梦新年” 北大学生服务总队举办元旦公益晚会	9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王玲华荣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10
俞可平主讲“才斋讲堂”第 109 讲：政治学的公理	11
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	13
心系教育，大爱情怀——袁东英老先生慷慨捐资设立鸿升教育基金	21
北京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布《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	23
首届中日韩人口与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6

### ■ 网教之声

创新者的实践——3 年了，MOOC 到底能不能颠覆教育？	29
杨东平：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49

### ■ 北大人物

苏勉曾：勉运家国 增臻学术	56
张平文：一念为教 一生为学	63

### ■ 学者谈读书

楼宇烈：读书与做人演讲实录 ----- 68

熊培云：在一个语言上自相残杀的年代，我们读诗 ----- 77

### ■ 好文共赏

林建华：北大教育发展之路 ----- 84

### ■ 史苑钩沉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 91

### ■ 大美北大

燕园 雪中 ----- 95

### ■ 学员心声

北大国培，走过何曾离开 ----- 97

## 编辑寄语

2015 年就到底，新年的脚步近了。辞旧迎新的时刻，林建华校长与师生座谈，谈北大的教育发展之路，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和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北大教育教学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本期好文共赏与大家分享校长发言，希望引发更多的人共同思考、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2016 年元旦快乐！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鹁、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新闻动态

### 北京大学举行2016新年教育论坛

12月19日，“传承与创新：北京大学2016新年教育论坛”在教育学院112会议室举行。本次新年论坛秉持“深入探讨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理念，邀请高校、科研机构、教育实践领域的专家莅临指导，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位嘉宾参加、交流分享教育研究成果。



论坛现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晓宇代表学院向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和与会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在开幕词中，他强调教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我国现行教育系统存在创新性不足、杰出科技成果较少和论文被引率较低等问题；科学技术创新基于基础知识的传承，

没有传承，创新就会失去基础和活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传承与创新”，即是希望能在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采取制度性措施以实现创新能力的有效转化，最终实现突破与进步。



陈晓宇致辞

随后，教育学院名誉院长闵维方、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袁本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代理院长秦惠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分别作主题演讲。

闵维方发表题为“‘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主题演讲。他以多个国家为例，阐释了在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投资驱动的经济体将面临的困难和挑

战，指出国家战略需要通过重视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并进一步提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四个战略方向：加大教育投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高等教育系统分层分类，明确不同高校的合理定位；加强运用信息技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完善课程、教学、招生、管理体制等制度安排。

袁本涛以“研究生教育质量：基于学术发表的视角”为题，通过在校研究生的参与率、第一作者率和贡献率三个指标，分别从国际和国内高水平论文的维度来衡量我国在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他指出，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我国学科分布、机构分布呈现了“集聚效应”，特别是理工科研究生的培养已达到较高水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不同培养机构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差异较大，高水平研究生主要集中于少数高水平培养单位。

秦惠民发表题为“中国公立大学章程建设的实践与反思”的演讲，提出要正确认识 and 对待大学章程。他指出，制定章程是一个在大学践行民主与法治的过程，大学章程应当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可突破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律规定，不能与法律法规相

冲突。大学章程可视为一种教育软法，是一种“软约束”机制。

石中英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探讨了教育政策与教育研究中的“质量”概念，并以教师质量评价为例阐释了教育质量不可尽数、教师素养难区分高低、部分教师素养难以与公民素养和人文素养区分、教师质量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关系不清晰、绩效主义倾向等五个问题。他认为，教育质量的提出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评价工具，是标准化运动的标签。教育活动中的质量观有利有弊，它向教育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培养了教育领域的竞争文化，同时也削弱了合作意识。教育质量对教育改革方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在理解和使用教育质量时应当对其价值假设进行批判性分析。

在之后的分组讨论环节，各分论坛围绕六个主题进行，与会代表分别就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国际化与高校教师发展、职业教育、院校转型与发展、道德教育、民族教育和博士教育、互联网教育等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代表们积极参与，踊跃发言，会场内思想火花激烈碰撞，交流气氛热烈温暖。

随后，论坛进入总结发言环节。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十三五”时期我国教

育的形式和政策要点，指出这一时期教育的重要使命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办学、治校）、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李曼丽基于对日本七所综合性大学改革与实践的回顾与反思探讨了日本大学通识教育的变革问题。她通过对 1990 年至 2015 年日本通识教育改革的分析，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变革使得理念和制度形神兼备的通识教育在日本大学已然成型；第二，关注通识教育课程质量，关注教育过程，以提升教育质量；第三，通识教育需要明确、强有力的实施主体；第四，通识教育师资与教师意识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作了题为“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的发言。她提出了“精约教育”与“博放教育”两种“理念型”教育模式：精约教育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的中心，强调习惯、苦学和努力；博放教

育的主要目标是废除任何形式的强迫，彻底解放儿童，强调兴趣、乐学和天赋。她进一步指出了精约教育与博放教育两种教育样态的问题和内在联系。

教育学院陈学飞作了题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导向是关键”的发言。他强调，大学不是研究所，也不是技术推广站，应当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第二，大学的核心使命是追求真理、探讨高深知识；第三，建立良性学术评价机制；第四，遵循教育规律办学。他指出，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差距不在于具体评价指标，而在于理念、制度上的差距和导向偏差，只要导向正确，我国距离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最后，各分组讨论的点评人上台总结各组讨论成果，在热烈的总结交流后，“北京大学 2016 新年教育论坛”顺利落下帷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让青年成为数字丝路的主力军

人民网 12 月 16 日电（张歌）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合作共赢”论坛于 16 日下午在乌镇举行，就如

何使数字丝路落地并取得实际的效果，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进行了发言。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

朱善璐认为，“一带一路”是经济之路，是科技创新之路，是贸易之路，是旅游之路，是心灵之路。这个丝路的灵魂实际上是心灵的沟通、情感的连接。我们的行动怎么样做？不仅要仰望星空，更重要的要脚踏实地。朱善璐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推进，使数字丝路落地并取得实际的效果。

一、变成青年之路，也就是青春之路。大学是研究高学问、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数字丝路说到底是人走的路，人走的路中间有一支具有活力创造性的力量，无论是昨天还是明天他们都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青年。“一带一路”道路上的各大学的学生们，以及各个国家的青年，他们是数字丝路的参与者、创造者。使数字丝路的沿线几十个国家的大学生能参与这个丝路的行走和创

造，有特殊意义。朱善璐建议在互联网发展中包括丝路建设中，让青年加入数字丝路的创造，让青年成为这支大军中的生力军，大学应该维持有更高的自觉来参与数字丝路建设。

二、进一步扩展人文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争取实现新的数字丝路上的灵魂引领，把这个做起来。

三、作为创新之路。数字丝路是创新的结果，历史上有丝路但是无数字，今天“数字+丝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晶，因此这条路应该是一个方式和模式的创新，包括资源整合的创新。朱善璐呼吁全球的大学都应该关心正在带来的生产力的一场新的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互联网为标志，做出当代大学生的贡献。另外希望大学的学者和大学生们关心人类共同命运体的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数字更好结合，实现共赢。

来源：人民网

编辑：江南

##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评选

### 中北大获奖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

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获奖名单。北京大学共有49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23项,获奖总数连续五届蝉联全国高校榜首。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教育部为表彰和奖励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卓越成绩,激励广大科研工作者严谨治学、勇于创新、锻造精品,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该奖始设于1995年,目前每三年评选一次,由于组织严密、程序科学、评审公正,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本届评奖工作于2015年1月初正式启动,前后历时近一年,经高校推荐、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和奖励委员会审定,最终评选出

获奖成果908项,其中一等奖50项、二等奖251项、三等奖596项、普及奖11项。这些获奖成果是从2011年至2013年期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的7万余部学术著作、96万余篇论文以及2万余篇各类研究咨询报告中脱颖而出的,可谓优中选优、精品纷呈、众望所归,每一项成果都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为了使大家对本届获奖成果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近期社会科学部将以相近学科领域专题报道的形式,在学校新闻网上分五期对主要获奖成果进行介绍,也希望能借此机会,为大家展现一片丰富多彩的人文社科研究天地。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乘爱之翼，济梦新年”

### ——北大学生服务总队举办元旦公益晚会

12月19日晚，由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指导、学生服务总队承办的“乘爱之翼，济梦新年”2016年元旦公益晚会在正大国际中心弘雅厅举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出席活动并致辞。8家捐赠方代表、15个校内单位代表、燕园领航导师、优才拓展带队老师和学生服务总队毕业队友一同参加活动。

晚会在抒情朗诵《写在春天里的序》中拉开帷幕。诗词由学生原创，生动展现了学生服务总队的成长历程，梳理了一年来的公益服务、能力培训、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活动成果。

叶静漪转达了校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对各界朋友的感谢和对学生服务总队的新年问候。北京大学乘着改革的东风，在2015年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校友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4位北大人（7位教授、7位校友）新晋两院院士、学生资助工作连续四年在全国绩效考评中名列第一，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也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北大师生的齐心协力。

她指出，学生服务总队成立15年来，在公益服务、能力建设、学生成才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毕业校友又主动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涌泉优才基金”，号召北大学子感恩回报，让人欣慰。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叶静漪希望社会各界和校内各单位继续出资出力，支持北大发展和学生资助工作，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拼搏、再创佳绩。



叶静漪致辞

在随后举行的2015年度学生资助表彰与感谢仪式上，叶静漪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银行、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玖琪商场有限公司、上海市水利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三弦公益基金会、张晓辉、宋大成等捐赠单位或个人，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招生工

作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总务部、餐饮中心、公寓服务中心、生命科学学院、体育教研部、图书馆、档案馆、计算中心、燕园社区服务中心、百周年纪念讲堂、邱德拔体育馆、教育基金会等校内单位，为燕园领航导师宋春伟、优才拓展带队老师刘丽萍颁发了感谢状，感谢他们在过去一年对学生资助工作的支持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爱。各单位纷纷表示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受助学生完成学业、提升能力。叶静漪还为获得“2015年学生服务总队优秀队员”的学生发放证书，表彰他们在公益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之后，播放了学生资助中心2015年工作汇报片和校友祝福视频。学生服务总队队员带来了成长风采展示。舞台剧《燕归巢》反映了学子对家乡亲人的真切思念；短剧《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真实再现“善行一百爱心包裹”活动中的酸甜苦辣和对公益服务的思考，让大家感动不已；上海、广西等四个暑期优才

拓展团队分享了对社会服务和社会热点的思考，个人在活动中的收获体会；歌舞《青春飞扬》、合唱《明天更美好》让在场观众感受到浓浓暖意。

其间，由学生服务总队已毕业的队友、学生资助中心、校友工作办公室和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涌泉优才基金”举行了启动仪式，该基金旨在希望受助学生在有能力时捐款支持学校发展，鼓励受助学生努力拼搏、感恩回报各界关爱。



北京大学涌泉优才基金启动仪式

来源：央视网

编辑：江南

##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王玲华荣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2015年12月22日，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在北京颁发，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研究员王玲华与其

他8位女科学家，从172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摘得这一奖项。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是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进行评选



表彰的奖项，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等于 2004 年联合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女性青年科学家，激励她们继续从事科学事业，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截止 2015 年 12 月，共有来自全国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105 位女科学家获奖，其中有 9 位获奖者来自北京大学。

王玲华于 2009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空间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Robert P. Lin，在享有盛誉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空间

科学实验室学习和工作多年，2012 年入选“青年千人计划”。王玲华主要从事日球层物理方面的研究，发现了在平静时期日球层中存在一种未知的高能粒子成分——晕外电子，参与了多项国际空间探测项目的粒子探测器的研制和观测分析，负责探测数据的校正和解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CINEMA 小卫星计划是基于王玲华等对磁层环电流片中性原子成像的一项研究成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俞可平主讲“才斋讲堂”第 109 讲：政治学的公理

12 月 3 日晚 7 时，阵阵笑声从理教 207 的教室中传出。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做客“才斋讲堂”，结合政治生活中的实例，与在场的师生们分享政治学的公理和民主政治的要素。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明利主持活动。

什么是公理？政治学的公理又是什么？俞可平开篇就抛出这样的疑问。他认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学科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这个

规律便是政治学中的公理。政治学的公理和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中的公理不同，它更侧重于政治现象背后运行的规则，违背这些规则便会受到惩罚。俞可平介绍说，当前学界对政治学公理这个概念有较大的争议，也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他认为，研究政治学背后运行的规律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政治学的本质，即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而且有利于指导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

作为一门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学科，政治学的许多理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

着特殊的反映。俞可平使用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了解读。例如，针对公务员压力大、官员社会评价低、官场信息失真等社会问题，俞可平认为这些体现出“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政令须出一门；由上至下的决策指令信息与由下至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等政治学规律。针对当前反腐力度加大、反贪法律众多（多达 102 部），但腐败还是屡禁不止的问题，俞可平认为，除了这些腐败分子自身立场不坚定之外，更多的是权力审查与分配的制度问题。他强调，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形成“封闭的环”，才能保证不会被滥用。俞可平讲话风趣幽默，有着长期研究经历的他信手拈来的例子引人入胜。



俞可平在讲座中

接下来，俞可平将视野从现实转向了学科本身，他总结了政治学的三个公理：第一，人类社会都有共同的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尊严、安全与和谐是人类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第二，政治制度是近代的产物，从国家与公民的角度来讲，是国家与公民签订的合约，国家的宪法是公民与国家订立的最高政治合同；第三，人类发明了众多不同的制度，其中，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俞可平重点解释和探讨了民主制度。民主，简单的解释便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进一步讲，民主是需要建立一系列确保公民人权的机制，即一套“授权”与“限权”的制度。很多人认为民主是虚化的、和现实脱节的，还有些人认为民主是西方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但俞可平认为我们应该关心并重视民主，因为公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背后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背后便是公共权力的分配——民主与民生紧密相连，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认真考虑和积极关注的。对于“民主属于西方”的观点，俞可平则举例反驳，民主起源于公元前 1100 年黎巴嫩，这是有确切的历史证据和文字记录的，所以民主绝对不是独属于西方的价值观，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俞可平认为民主不仅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且同样有程序的意义：民主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使得公民活跃起

来，使得公民的参与度与参与热情提高起来，即民主应该是一个“旋转的螺旋”。

之后，俞可平进一步探讨了民主政治的要素，即选举、协商、参与、法治、透明和分权。民主政治是一种选举政治，各级政府的官员，应当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这是民主的第一要素。但是另一方面，选举不是民主的一切，不能搞选举崇拜，民主也需要协商。从原始社会中的氏族会议到现在的政协，协商作为直接民主的基础是最古老、也是最新型的民主形式。民主也需要公共参与，在民主政治下，国家要最大限度地鼓励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参与，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另一方面，民主也需要完善合理的法律来保障运行，即民主政治是一种法治下的政治，这种法治是以宪法为最高权威，区别于以统治者权威的古代法治。



活动结束后，俞可平总结说，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政治学中重要的公理。但是政治学的公理在作用于不同的环境时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政治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带有当代的中国特色。最后，俞可平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文/新闻网学生记者 魏晗博）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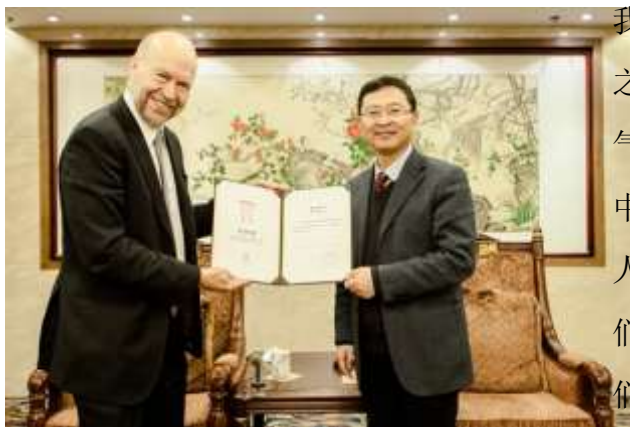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气候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于2015年12月21日-22日来校讲学。其间，他与

北大物理学院大气物理系师生进行座谈，并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发表了题为“气候变化的机遇与挑战：通向清洁能源与稳态气候的可行之路”的演讲。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等科研院所的 200 余位师生在现场聆听了汉森教授的精彩报告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主办，北大国际合作部与物理学院承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21 日下午公开演讲开始前，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会见了詹姆斯·汉森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顶尖学者铜牌及证书。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胡永云教授陪同会见。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是北大目前最顶级的、代表最高学术水准的讲学项目。该项目旨在广泛邀请全球各领域的顶尖学者来校举办讲座、开设课程、合作研究，目前已有超过 20 位各领域的顶级学者入选该项目，其中包括崔琦等 10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高松向詹姆斯·汉森教授颁发“大学堂”顶尖学者证书

演讲开始前，主持人胡永云教授向在座听众介绍了詹姆斯·汉森教授的主要成就：汉森教授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先锋学者，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气候学家之一。他于 1981 年在 Science 发表的文章首次使公众意识到了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对气候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成功地预测了气候变化的趋势。由于汉森教授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于 1996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多项学术与社会荣誉，包括 2006 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100 人”，2010 年获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苏菲奖（“诺贝尔环境奖”）等。

在演讲中，汉森教授首先提出希望青年一代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现状，他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未来的领袖，我想留出一些时间来和年轻人交流。在之前几天的行程中，我一直在与能源和气候领域的专家们交流能源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所以我希望能让在座的年轻人认识到现在的情况，因为这关系到你们的未来。”汉森教授指出，相对于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空气污染问题，我们并不能很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地球系统的惯性很大（地球的海洋约 4 千米深，冰川约 3 千米厚，

它们的热容量大大超过大气层），对外界强迫变化的响应相对缓慢，当下的排放不会在瞬间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的响应确实存在，而且会受到正反馈作用如冰雪反照率变化等的加强。全球变暖是几百年来人类活动积累的结果，同时这个效应是在逐步放大、显现的过程中，当我们现在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已经十分严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失控的边缘了。如果等到下一代人发现气候明显变化之时再做应对就为时已晚了。由于工业时代的粗放型发展，人类活动已经使得二氧化碳上升至 400ppmV（百万分之四百），同时我们的排放还在不断增加，因而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汉森教授指出，现在的科技水平使得我们已经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解决方案很多都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但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我们采取的实际行动远远不够。



演讲现场

### 潜在的不公平

就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样，气候变化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也不一样。当下气候变化的现状是几代人共同累积的结果。对当代人而言，这一影响尚且不大，但对下一代人而言这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种对后代的不公平。汉森教授强调，我们这代人有关义务控制气候变化，不能给未来的年轻人留下无法解决的困境。另外，在南北半球也会存在差异甚至不公平的现象，因为大多数化石燃料的排放都集中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但是其影响以低纬度以及南半球更甚，这样就给本来消费较少化石能源的人带来更多的影响。第三，其它动物相对于人类也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人类不采取任何减排措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到本世纪末会有 25%-50%的物种灭绝。

另外，汉森教授提到，虽然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化石能源使用国家，但是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累积的排放。因为二氧化碳在沉积到大洋底部之前，会在大气中存在超过千年的时间，当下大气层中人为活动增加的二氧化碳是几百年来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留下的产物。从最近的研究成果来看，在1751年到2014年间，美国和欧盟的排放总量占比都大于四分之一，而中国和印度只占到10%和3%。但是如果平均到人口数上，中国的排放更是远远低于美国、欧盟、德国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



詹姆斯·汉森教授在演讲中

### 气候变迁的影响

汉森教授接下来对气候变迁不可逆的影响从三方面进行了阐述：

#### (1) 物种灭绝

讲座中，一幅只有半边翅膀的蝴蝶照片引发了大家的注意，汉森教授指出，全球变化不仅使人类，也使其它生物都

处在危机之中。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主要气候区都发生了漂移，特别是人为影响比自然的气候变化速率快得多，很多物种并不能适应这些变化，从而导致物种灭亡。举例来说，黑脉金斑蝶在一年中迁徙往返于墨西哥中部和加拿大之间，但是他们现在正遭遇灭亡，主要原因是这种蝴蝶幼虫的主要食物——马利筋（milkweed）因为干旱而减产，而干旱是气候区迁移的一个重要结果。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我们熟悉的珊瑚礁，地球上每年都会有1%的珊瑚因为海洋的变暖而死亡。其实不仅是珊瑚，洋流的酸化也会导致有碳酸盐骨架的生物，比如贝壳类动物因为骨架溶解而死亡。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一旦发生，就再也难以挽回，我们不应亲手将地球上这些友好的邻居一个个送向毁灭。

#### (2) 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

气候变化另外一个不可逆的影响是冰盖的崩溃和海平面上升。冰盖的形成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而全球气候变化正使得它们以比这快得多的速度溶解。以格陵兰岛为例，由于温度升高，夏天冰盖融化后产生的水会流到冰盖底层，润滑冰盖使其加速向海面移动；另外升温后的海水也会加大洋面上冰架的融化速度，从而加速冰盖向海面移动。现在科



学家们能够借助卫星对地球引力进行精确的测量，从而反演出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质量。不容反驳的观测揭示出这两个冰盖都在加速融化。与此同时，当前模拟表明，全球海平面高度将以约每世纪 33 厘米的速度上升。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值，从地球的历史来看，如果我们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冰盖很可能以比这快得多的速度融化掉。汉森教授最近的研究显示，加速融化的冰会减少海水的盐分，从而影响洋流，阻碍深层暖的但是密度更大的海水向太空中释放能量，这样形成正反馈作用会加重冰盖的融化，这也造成了我们观测中发现的不断增加的上升速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地球古气候角度看，上一次全球温度达到高于工业革命全球气温前 2 摄氏度的时候，全球海面上升了 5-9 米；上新世时期海平面则由于 3-4 度温度变化而上升了 15-25 米。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处在海岸线上，这样的上升将是致命的。汉森教授确信，如果我们继续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全球海平面会在本世纪末上升数米之高，很多近海城市将会被淹没。投影上展示了一幅中国沿海将会遭到淹没的区域地图，使得观众们陷入深思。

(3) 极端天气肆虐——热浪、干旱、大火、暴雨、洪水、强风暴

汉森教授随后展示了一幅被称作“Bell Curve”的图表，他强调，如果以 1951-1980 年为标准态，2010 年后在北半球夏季地面气温均值已经漂移超过了 1.5 个标准差，而且在 1980 年前很少发生的事件（大于 3 个标准差）如今发生的概率已经大于 10%了。同时，这些漂移也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在美国的夏季，漂移超过了 1.5 个标准差，但是在中东地区的夏季漂移已经超过了 2 个标准差。

这些漂移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因为温度高的空气会携带更多的水汽，这样就会产生高于气候平均态的降水；而风暴来自水汽凝结释放的潜热，所以更大的降水意味着更强的风暴。第二，如果夏天平均气温过高，会导致低纬度地区的户外工作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与此相比半数的非家务工作都在户外进行，所以气温的漂移会使得国家经济受到影响。第三，多达 30 项研究表明，气温的升高会促使冲突和暴力行为的产生，由于之前提到的气候区的变化，特别在相对不发达地区由于缺少相应的资金、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为了水源、作物生长区等等的争夺也会增加。这些冲突、

暴力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人际间，还将存在于团体甚至国家间。

### 全球能量收支失衡

有人会问，我们到底对环境改变了多少？接下来，汉森教授对全球变暖的原因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像给地球穿上了一件棉衣。当我们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时，这些气体会吸收长波辐射，从而减少地球向外部散发的能量，改变了气候系统的热量收支平衡：进入到地球系统内部的能量大于向外辐射的能量，这就是气候变暖的原因之一。不过地球气候系统需要时间来对温室气体做出反应，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暖只是总反应的一部分，其余的热量则像定时炸弹一样隐藏在深处。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能准确地测量变暖的隐藏部分。能量的绝大部分被储存在海洋里，因为空气吸收的热量较少，而陆地传热又比较慢。这就像我们在微波炉中解冻一锅汤一样，乍一看表面可能热气腾腾，实际上大部分热量都隐藏在汤里，而骨头和肉可能还是冰的。通过国际合作的项目，我们向全球的海洋里释放了多达 3000 个测量海洋温度和盐度的浮标。大量数据告诉我们，现在的地球确实已经能量失衡了，随着时间推移，海洋在持续地吸收热量。

这些隐藏的能量目前还没有显露并反映在气温的变化上，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它们的存在。

### 解决方案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汉森教授举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 (1) 碳排放费

首先是碳费（Carbon fee）的征收。汉森教授一再强调，这不是一种税收，因为所有征收的碳费都将用于补贴和奖励低排放的人群。最终在这一项费用上实现收支平衡。这一思路的来源就在于化石能源的价格过于低廉，而且使用它的人没有为自己造成的排放买单。所以我们应该为化石能源引入一个递增的价格，具体来说就是向化石燃料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再均衡分配给大众，这样节能减排的人们就会从这个做法本身赚钱，而消费化石能源过多的人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举措能够使得公众发现并认同他们成为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一部分，培养人们在碳排放方面的意识。与此同时，这个做法还会刺激新能源的创新，因为增高的价格会驱使人们寻找更加低廉的获得能源的方式，比如优化新能源、提高效率、寻找替代品等等。另外递增的价格也会给人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替代品，让市场有足够的时间去

研发，而不至于所有人都支付不起能源消费。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这一举措在解决气候问题的基础上并不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他强调，不合适的税收将会影响经济，但碳费不是税收。

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前不久巴黎气候峰会多数人的反对，不少政界人士坚持《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设定国家碳排放上限和开展碳交易的方案。汉森教授强调，在 190 个国家间协商一个公平可行的排放上限和交易机制十分困难，这也是这些年气候变化谈判举步维艰的原因，这样一刀切的做法与现实复杂的情况并不相称。“所以你就会知道，我们会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因为它们越来越便宜。《巴黎协定》没有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有的只是国家间的作秀：‘我们比哥本哈根那次更加努力’。”汉森教授如是说。

## （2）推行核能

最后，汉森教授给出了一个当下很快就能立竿见影的方案：安全、洁净的核能。他认为，核能将是对于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两个问题一箭双雕的良药。提到窗外的空气污染红色预警，他提到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

这一努力很可能将被严重的空气污染所削弱。汉森教授现在致力于促进美国和中国在核能与气候方面的合作，因为中国经济依旧处在高速增长的步伐中，未来对能源的需求非常旺盛，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现有的旧核电厂不同，新一代使用钍作为反应元素的反应堆拥有良好的被动安全性，这也是物理学家间的共识。

“不能告诉下一代我们有麻烦了，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问题，我们应当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讲座最后，他展示了两个孙子的照片，饱含深情地说道。他 8 岁的孙子在他一次全球变化的讲座后忧心忡忡，眼中含着泪水地询问有什么办法来拯救地球，这使得他感触颇深。

他同时还提到，在美国要诚实地告诉公众这些信息越来越难，因为工业界，特别是能源企业的势力强大，他们通过影响媒体，向公众传达不正确的信息，使得科学家传递真相的步伐举步维艰。

“美国的民主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演变成了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汉森教授在平时的交流以及讲座中都一再强调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家意识、年轻人社会责任感以及领导层快速有力决策的赞赏。

## 提问与讨论

在接下来的提问和讨论环节中，观众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两面性、地球工程解决气候变化可能性、能否将单独的极端气候事件和全球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等等。

汉森教授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他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要大大超过积极作用。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有着上千年的寿命，使用其它方式，比如地球工程来平衡二氧化碳增加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很难并且难以持续，“毕竟你不能指望立一把雨伞能够荫蔽子孙后代千年”，我们还是应当从源头入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现场还有观众从专业细节的角度提问，为什么汉森教授的论文中海洋模式和 IPCC 报告中的结果不尽相同。汉森教授强调这是他们模式的改进之处，所有 IPCC 模式都没能够完善地描述冰川融化的效应，低估了融化产生的淡水注入海洋后对大洋环流的影响。他们通过在模式中引入冰川加速融化的速度得到 2055-2060 年地面气温变化的模拟，这很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效应。作为一名科学家，汉森教授同时坦率地承认，即使加入这一过程，对海洋环流的模式仍然并不完美，但现实世界可能对此更加敏感而不是反之。

在其后的讨论中他还强调了政府应当允许替代能源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不是通过政策选择性的补贴和限制来人为地操纵。创新的动力是无穷的，在竞争中也可能再产生其它更好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尽管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中国和印度将需要很多替代能源来满足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而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由于其成本和较大的输出波动，将很难满足这一需求。汉森教授举例说，谁都不想在晚上没太阳的时候家里就没电了。

现场一名大二的学生提问，在贫困依然是个问题的情况下，征收碳费是否合理，应当征收多少，以及发展和环保之间应当怎么权衡。汉森教授认为中国对清洁能源有着潜在的巨大需求，空气质量和全球变暖两个大问题都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提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移，他认为，由于历史上的责任，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技术，而不是单纯地因为发展中国家当前排放的增加就一味地责备和苛求。需要意识到全球人口的增加也是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原因。同时，当社会发展，人们变得富裕，如果不采取措施，人均的排放也会相应增加。在应对人口问题上，

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由于负责的政策，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健康合理的人口规模。

对于碳费的具体额度，他再次强调了这一政策在敦促高收入人群控制排放的同时，将会提高普通公众的收入。同时这也能促使工商业界节能减排。因为商业企业的第一目标是获取利润，如果没有其它外在因素影响，自然最廉价的能源选择将会为之所用，但如果政府提供相应的渠道和经济上的刺激，比如碳费的征收，他们也愿意转向更加低碳的能源使用。此外，发展中国家认为对于发达国家之前的排放对它们造成的影响

需要补偿，碳费的国际间转移将能够实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世界的这一承诺。

说到未来的打算，汉森教授表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着学术研究，他希望将最新的、正确的进展不断地传达给公众。去年1月，他为了完成一篇论文，还曾闭门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已经74岁高龄的汉森教授至今仍然活跃在学术和社会活动第一线，为气候变化问题而奔走。他的钻研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令在场学者感慨不已。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心系教育，大爱情怀

### ——袁东英老先生慷慨捐资设立鸿升教育基金

12月17日，北京大学鸿升教育基金设立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捐赠方、86岁的财政部离休干部袁东英先生和全国各地的亲友专程赶来出席仪式。财政部离休干部局副局长傅健民，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党委副书记叶静漪、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文莉、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德英等共同见证了这一充满温情与感动的捐赠仪式。仪式由校长助理、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主持。

袁东英先生的父亲袁鸿升1927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为纪念父亲，袁东英先生和夫人梁玉芝女士希望将名下的共同财产——一套回迁房捐赠给北大，并以父亲之名命名为“鸿升教育基金”。该基金将用于设立奖助学金，支持北大优秀学子，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成长成才。袁东英先生及夫人为早日完成心愿，此次决定拿出10万元现金积蓄

先行设立基金。这个决定得到了袁东英众多亲友的支持与响应，共同捐资。

吴志攀在致辞中对袁东英先生及其亲友的慷慨资助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并向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的梁玉芝女士表示敬意。他表示，袁东英先生和夫人虽已80多岁高龄，却心系国家教育，不计个人名利，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这份对教育无私奉献的情怀与善举还感染和影响了身边的亲友同事，值得所有人的尊敬。吴志攀指出，北京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这些资助不仅体现了他们心系国家、心系民族的博大情怀，更寄托了他们对北大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期待。北大将用好管好每一分钱，让大家的期待切实转化为对青年学子的支持和鼓励，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期望。



吴志攀致辞

袁东英先生在致辞中深情讲述了自己参加革命及后来学习、工作的人生历程，怀念了父亲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鞭策，并动情回顾了当初设立遗嘱、筹划教育基金的过程。袁东英表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房产是国家分配的，理应回归社会，保持我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信仰。”袁东英还提及父亲曾嘱咐他在有条件时办个学校，而办学校并非易事，因此申请设立教育基金也是遵循父亲的夙愿。袁东英说，此项基金是由自己与亲友共同设立，虽然数额不大，却汇集着一份高岸深谷般的情谊，愿这份情谊在北京大学生根开花，也愿鸿升教育基金与北大一样千秋万代、生生不息地源远流长。



袁东英致辞

袁东英先生的侄女婿石风暴先生在仪式上作为亲友代表分享了自己参与基金设立过程的深刻感受。他说，袁东英

伯父一生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却用仅有的积蓄去做心中最神圣的事，这一想法得到了儿女们的大力支持。“在设立鸿升教育基金的背后，为我们呈现的不仅是宽阔的心胸和高尚的情操，更是一颗滚烫的心！”石风暴先生表示，作为晚辈，他们愿意也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沿着伯父的这条大爱之路，一代一代坚定地传承下去。



石风暴致辞

在现场所有嘉宾的注目下，袁东英先生及其亲友与吴志攀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吴志攀与叶静漪向袁东英颁发感谢状以示感谢。傅健民在仪式的最后发言，表示自己因这样一个捐赠活动而受到震撼，对袁东英先生及其亲友的义举感到钦佩。

庄重而简朴的捐赠仪式在满满的大爱中落下帷幕，而这种大爱也将会随着鸿升教育基金的设立而不断传递、延续，感动和感染更多的人。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 北京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布

### 《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

编者按：近两年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首都发展研究院联合开展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绿色经济模式综合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肯定，被挑选为成功的沙漠绿色经济案例，在世界气候大会向全球推介。

巴黎时间12月1日，在世人瞩目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份来自中国的“生态厚礼”被有关机构郑重推荐给世界——北京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有关方面和多家国际组织共同举办成果分享会，发布《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

《报告》聚焦中国库布其“治沙、生态、经济、民生”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展现中国企业积极响应、认真践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庄严承诺，分享中国在生态治理、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经验，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防治荒漠化、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的能力建设，推动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特别是 2030 年全球土地零退化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京大学介绍了《报告》具体内容。《报告》分析认定，亿利资源集团在改善沙漠生态、发展沙漠产业、消除沙区贫困、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成就卓著，创造了 4600 多亿元人民币的生态财富，修复绿化沙漠 1.27 万平方公里（其中库布其治理修复 1.1 万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6000 余平方公里），生态减贫超 10 万人，为 100 余万人（次）提供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创新，亿利资源集团形成并输出了一个成功的模式——“库布其沙漠生态财富创造模式”，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造福世界的沙漠综合治理道路。

《报告》显示，“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的核心内涵是：创新了“治沙、生态、经济、民生”平衡驱动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创新了“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商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的‘PPP+’合作机制”；构筑了“防沙治沙-生态修复-土地整治-沙漠生态产业开发即‘绿土地、绿能源、绿金融+互联网’”的沙漠生态循环产业体系，实现了“投资有收益，产品有市场，农民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生态环境有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沙漠治理成为继核电和高铁之后，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三张名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与北京大学认为，中国是全球沙漠治理的典范，内蒙古是中国沙漠治理的先锋，库布其是中国沙漠生态治理的缩影。“库布其模式”体现了高度的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其最大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数以千亿的生态财富，更重要的是让人类重新认识沙漠和利用沙漠，为世界更多的沙漠变绿洲带来了可能和希望。比如，“库布其模式”成功输出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年时间让甘草药材在那片渗透着苦咸水的沙漠上长得郁郁葱葱。“库布其模式”也正在积极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荒漠化国家和地区。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在会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要像



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已凝聚为中国的社会共识，升华为人民的共同信念，并成为社会各界的行动指南。中国亿利创造的沙漠生态财富模式，就是在坚定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伟大绿色发展构想和战略。库布其的实践让全球认识到，沙漠是人类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荒漠化治理对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作用，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利用好了沙漠，必将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必将加快人类生存空间的开拓，也必将让恶劣的生态、贫困和战乱远离人类。

王文彪表示，希望中国库布其的治沙理念、生态经济模式可以影响更多沙漠化地区的人民，走出一条“向沙要绿、向沙要地、向天要水、向光要电、变沙为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王文彪发言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赫塔尔、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莫妮卡·巴布、世界银行副行长蕾切尔·凯特、法国信托投资局气候部总裁皮埃尔·迪克雷、气候组织 CEO 马克·坎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裁马利克·阿明·阿斯拉姆·汗、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等政界人士、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近百人出席会议，对《报告》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真诚分享。

莫妮卡·巴布认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今日土地的状况与产出力，应当认识到尽快采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并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土地管理、促进荒漠化土地恢复这两个目标列为重中之重，在此方面，“库布其模式”提供了杰出范例。



莫妮卡·巴布发言

解振华指出，《报告》发布旨在通过分享中国环境治理中的成功案例，展

示出一个发展中大国主动承担生态责任、举国上下齐心探索的态度与行动，进而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与环境治理提供启示与参考。联合国多家国际机构出席此次会议，足以表明这一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中国的积极行动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肯定。



解振华发言

与会专家以数据分析强调了荒漠化治理对于全人类的重要意义——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最新研究，每修复 5 亿公顷的退化农业用地，就能吸收全球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总量的 1/3，除此之外，还能为当地增创居民就

业岗位、带来经济转型机会，推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也是距中国首都北京最近的沙漠，总面积 1.86 万平方公里。中国亿利资源集团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起在此开展沙漠治理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从“治沙”到“减贫”再到创造生态财富、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这一成果引发世界强烈关注，先后获得联合国“全球治沙领导者”、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5 年度土地生命奖”等奖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将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白杨

## 首届中日韩人口与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12 月 21 日，首届中日韩人口与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口学会人口政策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大学老龄健康

与家庭发展研究中心协办。来自韩国高丽大学、韩国东国大学、日本尚美学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等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近 40 人参加了会议。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家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主持。中心主任、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随后，韩国高丽大学 MJ Hwang 教授简要概括了东亚三国共同面临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并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缘起及背景。



韩国高丽大学 MJ Hwang 教授致辞

本次研讨会包括“老龄化与老年健康”“生育与性别选择”“人口政策与转型”以及“人口迁移”等四个专题。在“老龄化与老年健康”专题讨论中，

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日本尚美学园大学 Nobutane Hanayama 教授和首都经贸大学齐明珠教授分别发言。本专题的讨论内容包括“医养结合”在中国的发展、日本老年人寿命上限的概率分布估计以及中国省际间的死亡率不均等。

“生育与性别选择”专题围绕着生育性别选择和堕胎等问题展开讨论，韩国高丽大学 MJ Hwang 教授、南开大学原新教授和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周恭伟博士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本专题的重点包括韩国已婚女性人工流产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性别偏好所导致的“消失的女孩”以及中国政府应对出生性别比过高的相关举措和未来政策框架等三个话题。



韩国东国大学 Ik Ki Kim 教授在会议上提问

在“人口政策与转型”专题讨论中，韩国东国大学 Ik Ki Kim 教授、中国社会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 SoYoung Park 女士相继围绕中韩两国的人口转型与人口政策

对比、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研究以及韩国生育率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的 Meta 分析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人口迁移”这一专题主要关注中国流动人口家庭中儿童的发展、韩国国内人口迁移研究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等三个话题，北京大学周皓副教授、韩国高丽大学 Saebom Jeon 研究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段成龙教授分别发言。

最后的闭幕仪式由 Nobutane Hanayama 教授主持。陆杰华教授和 MJ Hwang 教授分别对下届研讨会作了展望，并建议中日韩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讨论应该引入更多的年轻学者，同时也通过此举促进中日韩学界的友谊长存。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网教之声

### 创新者的实践——3年了，MOOC 到底能不能颠覆教育？

#### 一、流程创新，是 MOOC 的最大价值

“大概要投入多少，才能做一门质量还不错的 MOOC？”某高校的一位老教师，向台湾大学的 MOOC 执行长叶丙成提问。这是 2014 年，果壳网与 Coursera 在北大举办的“知识青年烩”现场活动中出现的一幕。

叶老师回答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Coursera 曾面向学习者做过一次小规模调查，在上 MOOC 时希望看到老师出镜吗？”出镜，指在课程播放过程中，老师的头像长时间出现在视频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常见形式，是屏幕上主要呈现课程内容 PPT 或板书，老师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

“调查结果是，两种情况刚好各有 50% 的同学喜欢。不喜欢老师出镜的同学，认为老师的形象对学习没意义，而且始终盯着老师的头像看很无聊，如果恰好长得又不是那么漂亮……喜欢老师出镜的认为，有老师在才像真正的课程，否则是不是真的那个老师讲都不知道。”

各 50% 的支持结果其实说明的是：老师出镜并不必要。特别是考虑到老师是否出镜，制作成本差别相当大。出镜除了会对化妆、服饰、灯光、场地等有更高要求，更关键的是，如果出现 NG 就必须重来。老师不出镜，如果出现错误，改字幕、重录音即可。

叶老师继续介绍到，有些课程也尝试了在出镜的基础上减少成本的方式，例如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老师出镜来一段介绍，但进入课程正题，老师就再也不出现了。既可以满足展示老师形象的需求，又保证不对内容造成干扰。或者可以把老师的录像用小视频的方式嵌在课程界面的一角，俗称“小图无渣图”。这么小的画面，就不用担心分辨率不够或者拍得不好之类的问题了。如果出镜用电脑摄像头就可以解决，成本自然不会高。



MOOC 上课页面，老师通过小窗口实现“部分出镜”

有意，或许是无意地，上面的例子揭示出了 MOOC 的核心思想，那就是用容易改进的方式来制作教学内容。

回想 2012 年 MOOC 兴起之初，我们津津乐道的是又一次的在线教育革命。MOOC 除了可以让全世界的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一流的教育资源外，和十年前的公开课也有很多不同：大学发放的认证证书，让学习成果更有含金量；结合作业和考试的配套服务，让学习更加深入，知识掌握更牢固；课程在开课结束会自动关闭，用时间上的紧迫感来督促学习者尽快完成学习。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真的重要吗？线上教育为了体现传统教育中的仪式感，保留线下课堂的沉浸式体验和学习压力，就要把讨论、作业、考试全部继承下来。甚至课错过就没法再上也必须

一并模仿。这样对学生会有真正的促进？或者说限时关闭课程的方式，是在在线教育不温不火情况下玩的一招饥饿营销？

以此论者，只识皮相。

在真实的大学中，学期末课程结束，新学期课程会重开。重开的课程和之前相比有区别吗？即便同一个老师，也一定是区别的。他会根据上学期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反馈、总结、心得，对新学期的讲授方式进行改进。这新一次应该一定能比上一次讲得好。MOOC 也一样。每学期结束后，老师根据本轮教学中收集到的学生反馈，调整教学内容，改变重点难点的讲述方式，甚至为了适应互联网学习方式以及全球范围的学习者，重新设计教学方案。以上所有都能让新学期的课程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如果不这样做，MOOC 和十年前出现的公开课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换了一个新名字、从形式上增加了一些模拟传统课堂的配套服务？

每学期会出一个更新的版本，真的就有那么大的改变吗？

是的，这就是最重要的区别。开始进行快速的版本迭代，正是在线课程生产流程的一次重大改进。

创新是多维的。除了我们熟知的产品创新外，服务、结构、渠道、品牌等等各个维度都有创新的大把机会。流程创新也是众多种创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甚至可以认为，其他的种种重大创新，实际上都贯穿着流程的创新，或者说必须以流程创新作为基础。

针对学习者进行实验，收集反馈并改进，课程内容迭代生产，最终依靠品质赢得市场——每学期课程都重新推出新版本，在其背后支持的，就是这样一套流程。这是绝大多数互联网产品研发、运营的流程，时髦的叫法是“精益创业”，你也可以叫它“互联网思维”。它主要区别于过去几十年间的软件行业开发流程，为满足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而生。期待重金投入打造精品课程，一上线就要赢得世人赞叹，并在十几年间一劳永逸，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很难赢得学习者的认可。除去满足政绩工程的考虑外，这样的课程提供者，其对于在线教育的认识，只能说仍停留在十年前的公开课阶段。

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案上，用简捷、易改进、低成本的方式来设计生产，最终通过迭代，制作出更受学习者欢迎的课程——这是 MOOC 带给教育行业的一次流程上的重大创

新。这项创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今天它才刚刚开始。

## 二、技术是教育的想象力

相传在秦始皇的年代，工匠们就开始用流水线的方式制造兵马俑。但流水线的真正兴起还是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后，在 20 世纪初由福特汽车发扬光大。流程创新很难孤立发展，它往往伴随着技术进步、需求升级等多种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变化，不断演进，而后迎来真正普及。

前面提到的“精益创业”，发展的背景是什么呢？精益一词，来自于上世纪 80 年代丰田的生产哲学。丰田倡导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聚焦于为终端消费者提供价值。今天的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竞争也趋于白热化。以老板或产品经理的奇思妙想来指导产品研发，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围绕用户核心需求，快速迭代试错，是互联网公司的最佳选择。

互联网公司技术研发的流程也与时俱进，从瀑布式转向迭代式。在 21 世纪初，注重更快迭代的敏捷开发逐渐成型，这样的开发方法，更强调适应性，而非预见性。简单、变化、自我组织、尽早且不断交付，成为开发过程中信奉的原则或常态。

MOOC 得以实现流程创新，背后的关键技术，是计算机科学中相当重要的一支方向——数据挖掘。这是囊括了统计、在线分析、搜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模式识别以及知识图谱等等方法的一项综合技术。它让 MOOC 能更好地根据学习者的表现和反馈，不断改进教学方案及内容。



MOOC 中常见的视频内小测试，及时收集学习者反馈。图为 Coursera 的《Arduino 平台与 C 语言程序设计》。

有一道题，假如一个班里 50 名同学有两人答错，老师不会觉得这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但 MOOC 可以有十万人参与学习，按照这个比例就是四千人答错，那就是一个相当显著的问题。老师就会去观察思考，为什么这四千人会在同一问题上犯错，如何提供一个更好的讲解让大家掌握，从而让一个被疏忽的问题

获得重视。这就是上述的统计和在线分析技术已经在实际发生着的应用。

技术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流程。

过去几十年里，移动电话是被技术推动变化最为巨大的产品之一。从基于模拟信号的第一代移动电话大哥大，到第二代的数字信号网络，到 3G，甚至今天的 4G，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网络传输速度获得极大提升。可我们并不会因为用了 4G 的网络，和朋友打电话时语速比原来更快，技术当然没有改变通话本身。但从通信的角度来看，2G 手机可以发短信、上网；3G 时代的智能手机，取代了电脑及其他数码产品；而 4G 的应用想象还未展开……至少我们对手机通信的定义，已经远远不是只提供远程通话那样简单。

同样，技术也可以改变我们对教育的期望。只是把教育的载体从书本转移到收音机、电视、电脑和手机上，形式上从图文变成音频或者视频、游戏等多媒体，这样的认识也面临过时。

全世界主流的教育模式，都源自 18 世纪的普鲁士。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强调教育的普及和效率，但毫无疑问忽视了个体的发展。本世纪初的温内特卡制及而后几十年发展的精熟教学法，都希望对个体提供更多关注，以期达到更好



的学习效果。但个性化意味着较高的成本，小规模试验尚可，大规模推广则不可行。最终这些实验均不了了之。

好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通常的认识无外乎以下八个字：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既要都得教，又要教得好。前一句是教育者的理想，也是每个人作为学习者的应有权利。后一句则体现在教学成果上，在适合学习者成长的方向上最大效率地达成结果。如果说互联网的普及，如印刷术一般，让教育极大地接近了“有教无类”，那么 MOOC 则让“因材施教”的时代，真正到来。

MOOC 每增加一名学生，边际成本至多只有一台计算机或平板电脑，这意味着成本障碍不再存在。而除统计分析工具外，机器学习、专家系统、知识图谱等超越老师个体能力的技术将大显身手，根据每个学生已有的学习轨迹，包括阶段测试的结果，了解他们的擅长方向、犯错类别，甚至是不同类型知识学完所需的时间等数据。这都成为预测下一阶段该学生的学习难点及知识考察重点的基础，从而达成个性化教学，让精熟教学法的理念再度并充分实现。

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更可能让学习者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激发自信，

从而产生学习的动力。学习的动力会让学习者更加主动参与，积极思考，克服困难，学习进步得更快。正反馈过程一旦发生，人生就会获得极大改变。

好成绩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培养创造力，一定是未来的教育更加关注的目标。

建立起学习的正反馈，有关创造力的教育才真正开始。学习者会更加独立，掌握自己的学习，而不是完全由老师去推动。学生会更多地思考和尝试，更多地交流和分享，不惧怕失败而勇于创造。当创造的力量发展、聚集到一定程度，教育的概念必然发生质的变化。“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将不再是评价好的教育的最重要标准。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曾经戏说，杞人忧天里的杞人，就是当时的天文学家。不管他忧天的结果怎么样，在大多数人谋生活之时，他能思考这个问题，已属不易。可惜杞人只能作为一个反面形象，成为千古笑谈。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我们既缺乏有创造力的人才，也缺乏能够发现人才的教育家，更缺乏的是可以培养创造力的教育。

今天，可汗学院推崇的翻转课堂，MOOC 倡导的终身教育，knewton 为代表的适应性学习，包括正在兴起的 STEAM

概念普及等等，都在从各自的角度推动着教育不断向前。从传统的学好知识，到培养学习热情，掌握学习主动，从而塑造创造力。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技术都将是教育创新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量。

### 三、终身学习，还得靠社区

东汉范滂，遭党锢之祸，与母亲诀别。范滂安慰其母不要过度悲伤。范母答：“你今天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要声名，又要长寿，可以兼得吗？”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去世时三十三岁。

苏东坡十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在外，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讲到《后汉书·范滂传》，程氏感慨叹息。少年苏轼问：

“如果我做范滂，您能答应吗？”程氏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这段对话载入《宋史》，程氏既为古人感叹，而后人又为程氏所感。

即便处于性别极不平等的男权社会中，贤母教子的故事依然不胜枚举。此等事迹，有时仅因客观条件所致，但仍具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在2015年WISE大会的《女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演讲中，也指出赋予女性学习的权利，“……不仅能改变她

们的生活，也能改变他们的家庭、国家。”

终身学习，本质是一种人生价值观以及据此养成的生活习惯。家庭是养成这种习惯的第一站。绝大多数家长意识到教育的重要，可惜受限于他们过去的经验，无法把心愿化为行动。常见的场景是，他们尽力购买各种优秀读物，孩子却无动于衷，四处倾诉这种苦恼以求共鸣。

对此类家庭做进一步了解，往往发现，父母双方均没有养成日常阅读的习惯。对于读书、学习，他们认为只是孩子的事情，对自身意义已经不大。工作繁忙、家务琐碎成为他们最好的托词，至于逛街、饭局、搓麻、追剧、淘宝以及刷朋友圈，那都是他们缓解工作压力的必要手段。在学习这件事上，父母选择作为孩子的良师益友共同参与，还是扮演善于说教的监工只下达任务，在短期来看，对孩子的学习结果影响甚小，但从长期来看，养成的习惯却大相径庭。

家庭之外，即为社区。社区对家庭形成包围，并提供更多的言行参照，对个人学习价值观及习惯养成的影响更甚。“昔孟母，择邻处”是今天依旧鲜活的事例。

2015WISE 大奖的得主，是有着“阿富汗教育之母”之称的 62 岁的雅库比博士，她也是阿富汗学习协会的创始人兼执行总监。在美国成为大学教授后，雅库比博士又回到阿富汗，希望用教育拯救同胞。从在难民营开设第一个流动学习中心开始，20 年来她持续为草根阶层提供社区教育，包括初中等教育、教师培训、健康教育等等。开始只有几百人参与，但坚持到现在，她已经累计接触过上千万阿富汗人，培训了超过两万名教师……



2015WISE 大奖得主 “阿富汗教育之母” 雅库比博士在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 发表演讲

“我们的教育是从非常简单的条件下开始的，没有书没有房子，一步步的改善，现在已经拥有了教师、实验室和电脑，还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他们会思考，善于提问。取得这种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因为社区和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就是靠扎根于社区，加上

一步步的持续努力，雅库比博士在最贫瘠的土壤上，做出了让所有人惊叹的奇迹。

学习理念的形成，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可谓相当紧密。在线社区，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比现实中的社区力量更为强大。不仅是因为空间障碍消失，各地区的人都可以一起交流，产生了更大社区的概念，更因为当人们通过兴趣方向的筛选加入某个社区，价值观会更加趋同，彼此之间行为和观念的影响也会更深。

学习者的社区也是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同样的学习目标聚集，他们彼此认同、激励，产生的在线讨论及交流，也会对学习过程和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 MOOC 的教学过程中，在线社区的价值也随处可见。例如：作业在线互评让学习者参与到其他人的学习过程中，自己也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感觉。当然，这项创举也帮助老师成功解决了同时服务于数以万计学生的繁重压力。再比如，MOOC 学院中学习者完成课程后回到社区中对课程进行打分和点评，帮助其他社区成员在选课时做出更可靠的判断，通过社群的力量实现优质资源的推荐和信息共享。



很多教育者也充分认识到网络社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但老师的精力有限，如果真深度投入进社区，则担心陷入无穷无尽的琐碎问答之中，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无法为继。目前的解决方案是网络助教，包括大量网络上的优秀志愿者。他们大幅缓解老师的工作压力，并且及时向老师传递最为关键的信息反馈。

但想要建立并维系一个具有优秀价值观或文化的网络社区，相当不易，这需要运营者非常长期、细致甚至烦琐的工作。树立和维持价值观、建立社区规则、活跃社区氛围、产出有价值内容、保证其影响力规模并为社区带来新生力量……每一项都包含了繁杂的工作。如何通过高质量而又有特色的运营工作，迅速聚拢人气，达到社区能够健康发展所需的爆破点，一直是困扰众多社区运营人员最大的挑战。

Coursera 等海外 MOOC 平台都有不错的社区，但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学习者而

言，语言的障碍暂时无法逾越。学堂在线等国内社区，又在课程覆盖上有必然缺失。很多学习者甚至不得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方式交流学习。MOOC 学院网站上的社区通过学习者“大众点评”课程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社区的力量，但在学习者之间更即时、高密度互动的交流上，也有缺失。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催生社群的概念再次大行其道，又成为新的运营契机。但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学习者有机会随时随地接触学习资源，但面对新闻、音乐、游戏、快餐文学、约吗、买买买等的诱惑，学习的吸引力实在是孱弱无比。

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又何尝不是。

MOOC 学院的团队，在尝试为中国学习者提供一个移动学习交流社区时，曾发生非常激烈地讨论。反对方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前途的产品，所谓热爱学习的学习者，凤毛麟角。支持方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也提出，正由于坚持学习很困难，更需要志同道合者前行。MOOC 同学——果壳网又一个情怀远胜于价值的产品，最终在内部的争议中上线运营。

这样的项目在争取内部研发资源时会遇到很多挑战，一开始也只能保证基

本的功能模块，进行频次较低的迭代开发，推广投入更是有限。但 MOOC 同学的目标并不是流行于浮躁创业圈中的装机量、激活量等 KPI。每天在自习室中有多少真正关于学习的讨论、他们的互动是否真的有益于学习，这样的数据在这里更受关注。他们只求把爱学习的人聚在一起，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上，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维护一个属于学习爱好者的小天地。

#### 四、搞破坏，是 MOOC 的使命

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在一次采访中，“历史变革就像一场雪崩。起点是貌似坚实的积雪山坡。所有变革都是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有些事即将发生，但我们无法预知到底是什么时候。”

有什么比大学教育看上去更像那座覆满白雪的山坡呢？那些优雅的图书馆，高大的教学楼，先进的实验室，匆匆行走于其间的教授和洋溢着青春笑脸的大学生……在线教育能改变这一切吗？

《乔布斯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比尔盖茨到乔布斯家中探望，两个人交流了关于教育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计算机对学校的影响小得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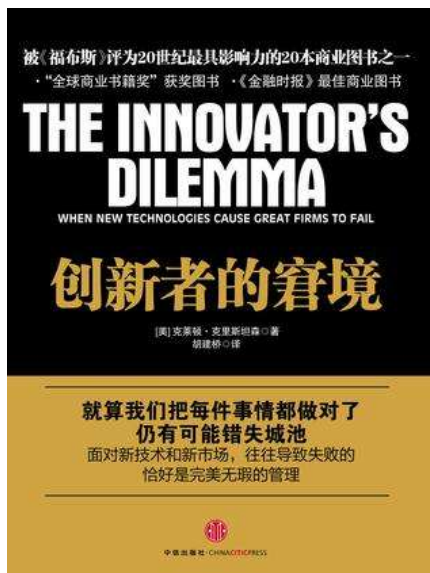
吃惊——对比诸如媒体、医药和法律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影响小得多。

虽然盖茨也提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可以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课程，并提供有启发性的反馈，以及未来的学校可以让学生们自己观看讲座和视频课程，而课堂时间用来讨论和解决问题等等。但毫无疑问，过去的二十年间，无论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概念，口号，计划甚至行动，教育依然还是老样子。至少这两位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家，在多年致力于用各种方式去改变数字鸿沟之后，是这样的结论。

所有人都相信在线教育终将改变传统教育，但至于什么时候改变，则众说纷纭。眼下热门的讨论议题，也围绕于在线教育是否能比传统教育更有益于提高成绩、掌握知识？完课率是否适合用来判断一种在线教育形式的优劣？也有人追根溯源，质疑获得高分和提升升学率是教育的本源。但无论怎样争议，除极少数 MOOC 从业者外，大多数教育行业人士对于 MOOC，都保持否定、不乐观或者观望的态度。

MOOC 的未来成败与否，各执一词。但若跳出教育行业本身，从产业发展规律这一宏观视角来观察，或许可以一览究竟。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于1995年首次发表“破坏性技术”这一创新管理概念之际，便跻身于管理学大师殿堂。其理论核心在于：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破坏性技术，行业中原来的领先企业会因此而被颠覆。并且因为受限于企业经营客观规律，即便领先企业管理完善、锐意创新，亦难逃厄运。



在《创新者的窘境》中，克里斯坦森提供了一个正在发生破坏性创新的领域列表，其中有三项与教育相关。

受到挑战的成熟技术是：

- 1、管理研究生院；
- 2、基于课堂和校园的教学；
- 3、标准教材。

与之对应的破坏性技术为：

- 1、企业大学和内部管理培训计划；
- 2、远程教育，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

远程教育；

- 3、由用户组合的模块化电子版教材。

如何来检验 MOOC 是否具备破坏性创新的潜力呢？以下三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组问题可以用来判断，其是否能成为新市场破坏策略。两个问题中必须至少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

1、在过去是否有这样一大群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设备和技术来做这个事情，因此只能放弃，或者花钱让更专业的人来做？

2、客户是否需要克服种种不便，到一个集中的地点去使用该产品或服务？

教育行业竟然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教育鸿沟或者知识鸿沟的存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发地区或者相对不富裕的学习者获得教育资源之难。而传统教育的典型场景，即是让学习者聚集到学校或教室听讲。MOOC 显然可以让缺乏资金等条件的学习者，能够在更方便的环境中拥有使用优质学习资源的机会。

第一组问题判断完毕，MOOC 具备成为新市场破坏策略的潜力。

破坏性技术之所以具备强大的破坏力，主要是因为它的市场切入从低端市场开始，逐渐升级。因此既有的市场占

有者将从无意竞争逐渐发展到无力抵抗。第二组问题可以判断 MOOC 是否具备低端市场破坏策略。

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均为肯定方可：

1、在低端市场是否有客户乐意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性能不那么完美的产品？

2、是否能创建一种业务模式，使服务提供方在以低价格吸引这些被“过度服务”的低端客户时，还能保持良好的赢利？

今天 MOOC 提供的在线学习形式，虽伴以各种技术辅助，但就整个体验过程，依然与传统教育相去甚远。但论发展规模，数以千万计的用户已经选择了使用 MOOC。课程内容这一核心要素是吸引他们的最主要原因。海内外一流名校名师资源，让平日只能接触平庸教师的学习者，大开眼界。

从市场领导者 Coursera 的角度来看，随着 MOOC 用户的增加，收入正在不断攀升，其瞄准的职业教育方向，可以让其获利更多。互联网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理论上只要规模足够，赢利能力应该不必担心。MOOC 显然具备低端市场的破坏策略。

经过了新市场和低端市场的鉴别，我们迎来了第三块试金石的检验。MOOC

是否能破坏业内的主要先入者，例如大学？

如果对大学或例如职业培训、MBA 等其他教学来说，这个策略只是延续性创新，那么先入者必然会占上风，而后来者无胜算可言。延续性创新，意为通过改进服务质量或产品性能，以满足主流市场中的高端客户的高利润服务。只是改变原有业务的流程和成本结构就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MOOC 当前提供的服务，既非高端用户，又非高利润，而提供的服务也并非在传统教学上更加完善到位，肯定不是延续性创新。

那 MOOC 破坏传统大学教育的机会在哪里？

仅以目前大学提供的传统教育服务为例，大部分教学内容与职业所需脱节，一方面达不到当前快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较为艰深的偏重理论研究的课程，又远远超出了大部分学生现实的需要。前沿、实用、质量有保障的职业化教育资源，是 MOOC 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MOOC 是教育行业的破坏性技术这一假设，完全经得起上述三组问题的推敲。至于成败利钝，既取决于 MOOC 领导者对面向未来之眼界格局，又取决于其着眼当下的探索实践。何者为常经，何时应

权变，皆超出眼高手低的评论家们能力所限。

全球的大学学府面对这位破坏者是什么样的应对？

很多全球名校已经开始积极制作课程。但一个 MOOC 平台的力量，远非一家大学所可比拟。因在历史积累的专业特色上有严重的路径依赖以及制作在线课程所需资源投入较多，世界知名大学目前至多只能扮演 MOOC 舞台上的一个名角，而非靠自己撑起一场独角戏。想在互联网上复制一所大学，这不仅仅是大学建设一个自有的 MOOC 平台，把自己的老师搬到网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国内大学的态度以及行动来看，现在还只有极少数的中国教育者能把 MOOC 放在眼里。其实不止于 MOOC，对于大部分中国教育者来说，他们从来不会灵活、细心地应用新技术，要么固步自封，要么抱残守缺，要么瞻前顾后，要么临渊羡鱼。他们侃侃而谈的，是无论什么样的新技术，都没法解决老问题。并且解决老问题，也从来不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曾有一种观点，MOOC 是一场中国教育输不起的革命。其实纵观历史，没有什么输不起的革命。无论革命是否波澜壮阔，历史的车轮终会滚滚向前。

或者只有被革命的人才输不起，但他们必输无疑。因为关于革命，历史教给我们的道理是——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

## 五、MOOC 的先驱，蹒跚前进

像 iOS 系统和 App 开发者合作一样，Coursera 选择和大学合作获得课程，对内容严格把控。而 edX 则更像 Android，用开源系统的方式对接更多教育机构。Udacity 和 Coursera 类似，但多和教师直接合作，在大学的方向上投入不多。加之全球化战略也不如另外两家开放，Udacity 一直不大被中国市场关注。但随着 11 月份公布了获得上亿美元投资的消息，Udacity 一举成为 MOOC 三巨头中的最有钱的公司，重新成为互联网教育行业的关注焦点。

Coursera 与大学免费合作，有时甚至主动承担课程的制作成本。大学还可获得 Coursera 课程认证证书收入的分成。edX 向合作大学收取会员加盟费用，收费证书上也会与大学分成。加盟费用的额度和课程分成的比例并不确定，优秀学校获得的谈判条件会更好。这些是 MOOC 平台当前最主要的收入模式。某些大学以外的机构也和 MOOC 平台有合作，例如：IEEE、W3C 及 linux 基金会等和 edX，世界银行等与 Coursera。



三巨头的三种不同模式，哪一种更有竞争力呢？很难判断。就像我们无法判断将来是 iOS 一骑绝尘，还是 Android 统一天下。但三种不同模式，对三家企业建立自己的成本结构和运营流程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选择与何种课程内容供应商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如何持续赢利等问题，也决定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就是所谓的价值网络。

选择构建不同的价值网络，说明三家企业对客户定位、市场分析、成本结构等问题的战略思考不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创新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观念又决定了他们在选择延续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时将面对怎样的机遇和风险。破坏性创新的标准模式是要找到“新市场——零消费者”，其判断标准需如下四点：

- 1、目标客户想完成某项工作，但缺乏资源，现有市场无简单便宜方案；
- 2、客户会把破坏性产品和“没有产品可用”来做对比。结果是客户很容易被取悦，对产品或服务的性能要求较低；
- 3、破坏性创新技术或许较复杂，但体现到产品上简单易用；
- 4、破坏性创新制造了一个全新的价值网络，新的消费者多数在新的渠道购买新产品，在新的场景下使用新产品。

如果用 MOOC 的学习者对照以上四项判断标准，皆为肯定。但这个问题不止这么简单。大多数平台类产品面对的是双边市场，除学习者，教育者或者说课程内容提供者同样在消费着这个平台。如何分析以及定位合适的教育者，才是这个问题中最难解的部分。



Udacity 创立之始即选择与优秀教师直接合作，平台协助或由教师自己制作课程，如当初创始人特龙自己一样。这样的做法，直接跨越掉大学，具备足够的颠覆性，一旦成功，必为大功。用上述四项判断标准对照，我们发现第 2、3、4 点自然成立。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第 3 点，对于教师用 MOOC 来上课是简单易用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基于前述的精益流程，而非制作精品课程的思路。但第 1 点是否成立，我们却难下结论，或许这正是 Udacity 此前发展较慢的原因。

目前的观点认为，高校有此类需求的教师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至少他们大多数人，在正式职业之外，不会有再去开辟一块网络阵地的想法。也许在职业的教师以外，反而有更广泛的潜在老师可以挖掘，例如类似法律、互联网、商业等行业可以提供培训服务的资深人士，或者是可以提供政经、历史、人文等讲座的专家学者，甚至数、理、化、生物等也有类似萨尔曼·可汗背景的人才可以挖掘。但跨出这一步，创新的步伐要比今天的三大 MOOC 平台迈得更远，其面对的风险亦将增大许多。

edX 和 Coursera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通过合作知名高校，间接发动教师。既然参与了 MOOC 行动，大学也乐于给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教师，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每增加一所大学，就会带来一批教师、一批课程，当然也会带动一大批同学。显然这比 Udacity 的策略，在初期会更加快速地发展。但很快发展的瓶颈期就迅速到来。因为，他们集体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参与 MOOC 的大学大致有以下三种原因：

- 1、因理想主义而产生的责任感；
- 2、这是不容错过的行业趋势；
- 3、让自身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后两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这两种理性的思考，恰好会带来不利的结果。

知名高校相对于普通大学，无论是资金来源、政府与企业合作支持、师生质量等方面，都处于相当优势的地位。对于任何健康发展的机构，新的发展机遇所意味的价值总是不够大。那么，知名高校能够尝试 MOOC 这样的创新，已经是了不起的举动，兴师动众则不值得，甚至有相当的风险。另外，大学里有眼光的管理者和专家，也可能洞见到 MOOC 是一项相当有破坏力的竞争技术。他们甚至清楚，如果 MOOC 成功，自己原有的优势业务会被危及，所以必须抽出资源来应对。但出于本能或者立场所限，他们会把 MOOC 视为对现有大学地位的威胁。这导致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利用新技术完善现有教学服务和教学体系上，而不会对“新市场——零消费者”更感兴趣。这样的错误策略只能在系统完成内部优化后，迅速停滞，不知如何进行下一步。

对于 Coursera 和 edX 而言，大学纷纷加入 MOOC 是一轮红利，拓展海外用户是另外一轮红利。中国和印度拥有大量渴望接触海外名校学生，的确符合“新市场——零消费者”的概念。但下一步呢？并没有连贯的战术。通过和中国大

学合作推动中国大学生学习，可算不上什么面向新市场的玩法，用户的发展速度自然就减缓了。

企业家无法实施彻底的破坏性创新，是什么原因？通常来说，在新的游戏开始，旧的游戏尚未结束之时，企业家们最容易做出路径依赖的决定。原有的业务越是强健，企业家变革的动力越加有限，有什么理由不遵照原来的成功经验呢？选择原有的资源、合作方、经验、流程、以及价值网络中的其他部分，既是顺理成章的逻辑，也是无法抗拒的诱惑。而且竞争对手们利用延续性策略，短时期内的获利颇多，会让自己更加沉不住气。即便如 Udacity，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跟随另外两家平台开始了大学和机构的合作。

国内的 MOOC 平台能跳出这个窘境吗？目前还无法判断。毕竟学堂在线或者中国大学 MOOC 都是国外 MOOC 平台的翻版。虽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怕夷人无暇自哀，而国人哀之，国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国人复哀国人也。耐人寻味的倒是网易，同时押宝中国大学 MOOC 和网易云课堂，这是表明两个方向各有前程，还是首鼠两端无法取舍呢？

## 六、矛盾和困难，如何破局

评论家讨论商业模式应如何运作；企业家在探索中建立商业模式。评论家凭喜好选择点评的对象；企业家只能面对现实塑造的问题。评论家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分析；企业家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评论家可待信息收集完善，分析是否中肯取决于个人学养；企业家必须当机立断，不可能有充足论据才做评判。评论家没有风险，分析错了就再分析下一个；企业家却机会有限，一旦失手覆水难收。

评论家和企业家的观点结论迥异，实属必然。因而这里对于中外 MOOC 的讨论，如何通过创新、保守或者妥协来解决生存与发展，检讨各自成败及成因，并非终点，是为开端。

从事在线教育的企业家，怀抱着改变现实教育的理想，也从来不缺少创新的能力。但当他们的产品开始面向真实的市场，为了迎合现有用户，即便深具创新潜力，也终被无情改造。这些企业家视教育为自己的责任和生命，愿意在今天的重重困难中坚守，也因为他们相信明天的美好前景。但也要考虑投资人能否允许自己的投入回报寥寥，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些美好前景。毕竟明天复明天，明天何其多。

如果追寻教育的本源，则要挖掘学习者的自身潜力，提升学习兴趣，培养独立思考。但市场上验证是否学业有成的标准，依然简单粗暴：即便不用帮学习者拿到企业的录取通知，或者通过某项认证考试，至少也要保证完课率——这一个业内津津乐道的指标。

在线教育的企业家们，不只是在重重困难中前进，更是在重重矛盾中前进。关于这些矛盾的争论甚至一直处于形而上的阶段。例如：学习是有趣的快乐的，还是注定枯燥。学习是应该轻松愉快的，还是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辛苦。压力对于学习者是有正面的作用，还是适得其反。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是要提倡有趣，还是提倡有用。等等等等……至于线下线上孰优孰劣之争，相比这些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虽然 2015WISE 大会依然面向全球的教育从业者做了一项调查，其中 29% 的人认为线上教育比线下有效，其他大多数人则持反对意见。

有人问欧几里得，几何学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讽刺他说，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故事无法考证，但今天也常见这样的问题。例如，MOOC 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或者是 MOOC 能赚钱吗？这么问可能更直接一些。互联网界流行的词是“刚需”。

不仅必须要用，而且没有替代品的，才是刚需。假如只学了风花雪月类的兴趣爱好，在当下的价值判断，就会归于有趣而无用，肯定不算刚需。那么 MOOC 对用户的刚需是什么？这正是 MOOC 从业者一直苦苦挖掘的价值。

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在大学学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这种价值并无办法证明。出示学历学位证书，虽然证明不了掌握了方法论，至少证明曾经在那里晃过一圈。MOOC 最初挖出来的价值点就是学历证书，或者换个叫法，比如学分证书、微学历证书……MOOC 证书能证明你掌握了某方面的知识，或者至少学过，再或者至少有点儿学习能力。然后平台推动国内的高校互相承认各自的学分证书，甚至想扩展到国际间的高校，以及企业也能认可。回溯起来，这些也都是做网络教育的那些高校玩过的，不新鲜。学习者为什么会需要这样一个证书？也许企业先认可了，学习者就认可了？

企业认可，相当困难，当然困难也意味着是一个新的市场机会。整个社会都在喊，大学教育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内容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职业教育成了一个新的风口，无论是不是 MOOC 都要扎到这个方向里，这自然成了 MOOC 企业挖出的第二个价值点。其实这本不

应该是挖出来的，因为需求一直存在。早在 20 年前，e—Learning 就是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是限于网速，不能在外网提供统一服务而已。但今天在线教育技术和在线教育内容服务的发展，已经可以更好应对市场所需，针对性地培养职业技能，让学习者被人才市场所认可接受。满足职业需求和 MOOC 的发展，并非前为因后为果，而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让职业需求通过在线教育实现水到渠成。



领英上学习者晒出的在线学习证书，来自 LinkedIn.com

到了这一阶段，MOOC 的企业家们依然有很多矛盾，国际化还是本土化？自制课程还是开放平台？全科教育还是专注垂直？与高校合作还是与个人合作？发力线上还是与线下并重？这里不会有唯一肯定的答案。但竞争力的本质，在于实现客户价值，而不是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儿。竞争基础发生改变，如果想保持竞争力，就得有意愿去学习新能力，

而不是怀揣幻想，守着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这是企业家与高校决策者的最主要区别。

高校也面临矛盾，但各家反应不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于是，先知先觉的海外名校迅速行动，后知后觉的国内一线高校试探跟进，不知不觉的国内其余高校，只是派出领导和老师四处学习，回家研究认为暂不可行，再观望着下一波概念的到来。

国家对此问题考虑也有矛盾之处。今天的国际秩序更接近 18、19 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未来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上巴西或者印度。这样的局势必然会让许多国家密切联系，寻求共识，建立交叉重叠的盟国体系，进而运用影响力来平息竞争。有些体系建立于政治、安全或者共同的原则，而更多则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毕竟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早已超出意识形态，甚至地缘政治。因而，即便有了 WTO，再出现 TTIP，TPP 也是形势之必然。

经济的基础是教育，评估一个国家的未来，双 E——Economics & Education 是最重要的两个维度。新兴的快速发展中的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教育

基础薄弱，不足以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所影响到的还不仅是经济，教育为社会稳定提供保障，同时也会培养公民意识，更好地帮助他们独立进行政治选择和决策。在线教育的发展让最好大学的围墙消失，学习者只要有学习的欲望，学习的资源唾手可得。政府必然逐渐转移重心，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知识和信息的流动更加开放，最终国家级的局域网也如同历史上的著名围墙一样，土崩瓦解。如果真是这样，又该作何解？

堵不如疏，更不如反守为攻。今天，期望自己在世界舞台有足够影响力的国家，都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 MOOC 运动中来。通过官方、高校或者企业的平台，把本国的优秀文化以及价值观输出。德国的 iversity，英国的 FutureLearn，澳洲的 OpenLearning，日本的 gacco……不胜枚举。在 2015 年初的 MOOC 课程横向评测中，gacco 还因自己的课程少而精，力压 Coursera 与 edX 成为课程平均得分的第一名。

如此多的国家、民族、语言、文化，交汇在一起，是人类教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景。儒家思想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由智者借助勤勉研究和教育才能洞烛。而真理往往通过各种理念冲突，相

激相异而生。当中国的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如此之多彩绚烂的文化，对未来产生的巨大影响，无法想象。历史上在明末清初曾发生过一次，后来在清末民初时又发生过一次，今天再度发生了。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西学东渐。”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 MOOC 学院正式上线时，如此评价。

### 七、MOOC 学院的理想和现实

教育工作者前仆后继，成为在线教育行业的企业家。而优秀的企业家又必须起到教育者的作用，教育团队、客户、合作伙伴及经验丰富的投资人，认可遥远前景的价值。不乏大量的企业家因眼高手低而受挫，但不论理论上如何分析，企业家都不能采取不作为的等待原则。即便他可以进行充分的评估，也可以为未来的不可知留有余地，但依赖时间的推进期待市场可以自然地成熟，或者出现新的转机，都是没有担当的行为。

MOOC 在中国的开局貌似不错，大陆的学习者在两年时间内迅速达到百万，一度被所有教育行业从业者高度关注，也影响到各类媒体舆论及中央政府机构的决策。但盛景之下，有重重隐忧。如果说原来大学之间也有竞争的话，那也是风和日丽的竞争，与企业之间的残酷搏杀无法相较。尤其在互联网行业，是

赢家通吃的结局。每位企业家投身在线教育的初衷是经经济人，但并不妨碍其对竞争者痛下杀手。尤其是各大 MOOC 平台都把发展的第一阶段瞄准在争夺优质高校资源，冲突在市场还未培育成功之前就已发生。手握优质教师资源的高校，一方面左右逢源，待价而沽，另一方面也蠢蠢欲动，问鼎中原。

中国的其他互联网模式，都以美国有成功先例为开始，随之多家本土企业竞相抄袭，再搏杀出前几名而尘埃落定。但 MOOC 不同，头三年完全是 Coursera 一家独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平台跟随进入。通常来说市场的领导者会承担开拓市场的任务，开拓市场的成本虽然偏高，但无论从现实的用户增长和长远的品牌培育，领导者总会获利最多。市场的挑战者和追随者则会搭乘顺风车，既因自身需要韬光养晦，又可以用相对低成本的方式获得初步的用户积累。但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事实上的市场领导者，并未主动推广市场，只依托较浅合作顺其自然增长。而挑战者或者追随者从 MOOC 用户增长红利中自然有限，他们的市场地位又注定各自不会有意愿冲到前面。14 年下半年到 15 年整年，整个 MOOC 市场在用户增长上，相当缓慢。

MOOC 的不温不火，成为质疑者的最好理由。而 MOOC 作为一种创新模式，其支持者的理想远胜经验，他们除了最终用丰硕的数据证明之外，别无他法。有远见的人，往往很少受到尊崇，因为他们的判断远超同时代人的经验和想象力之范围。而当远见成为时人的经验时，或许他们会被承认，但更多早已被遗忘。何况 MOOC 如荆山之玉，献玉之人尚不能窥其精华。以此判断，网易教育与学堂在线的决策者，可谓远见之人。

Coursera 错过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但余威犹存，学堂在线的用户量已经与 Coursera 中国的用户数不相伯仲。网易的云课堂随课程质量不断提升，也在验证着破坏性创新开始发挥作用。这三家公司，对于“新市场——零消费者”的认知定位和营销运作能力，决定了谁可以在未来一年内成为中国市场新的领导者。

MOOC 学院的出现，是基于对 MOOC 前景的看好，以及认为未来必然是群雄并起的局面。每个较为有文化影响力的国家，都至少会有一到两个 MOOC 平台。而 MOOC 平台所承载的文化和价值输出等重要意义，意味着每个国家的代表平台不会轻易消亡。7 到 8 家较大平台，30 到 40 家较小或特色平台共存，是可期待的

一个场景。MOOC 学院借此也可以在 MOOC 的价值网络中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成为汇聚 MOOC 学习者，建立终身学习的文化社区。

MOOC 的竞争局面，和当今的世界格局，或者说一两个世纪前欧洲的格局也颇为类似。MOOC 学院同样希望在在线教育行业中，也能够衍生出一个像梅涅特体系，以共识来强化均势局面，和平或合力发展，共同增强力量以颠覆传统教育的联盟。但寻找到这个共识并不容易，因为各自理想过于高远无法具体，而现实之间的竞争又难以回避。MOOC 学院在多次尝试后，发现其最满足学习者的价值——好课推荐，是可以和各家平台达成的最佳共识。因为无论各家平台如何竞争，最终都必须将其竞争力塑造在提供优质课程内容上，没有第二选择。而作为 MOOC 平台，脱离大舞台不与其他人相通相较，独立于世外也不可能。因而在一年多的运营后，MOOC 学院推出的评分标准，初步赢得了学习者、教育者、各主流平台的认可，成为 MOOC 学院最核心的竞争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单一的 MOOC 超大平台，会对 MOOC 学院构成战略意义的风险。因为一旦他的实力主要是影响力，凌驾于其他平台及 MOOC 学院之上，均势

的破坏就有了发生的基础。即便其负责人开放开明，MOOC 学院也必须抵御此风险。因为那时 MOOC 学院的有效抵抗力量将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态的发展。虽然从市场竞争来看，MOOC 领域不会出现单一的超大平台。但在并购、投资频繁发生的今天，出现任何新闻都不会令人惊讶。对于希望与可能性之间的判断，只能臆测，而真正的谈判实力，还是要靠所拥有的用户数量。

为此，MOOC 学院必须承担起推广市场的重任，让学习者先知 MOOC 学院，而后知 MOOC。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场场校园地推，一轮轮线上活动，一批批优秀学习者的塑造和积累，都是不可省却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则需要那些更贴近学习者，更了解学习者，甚至自己就是学习者的团队来完成。

在本文最初提到的会议上，听罢台大执行长叶丙成的分享，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老教授感慨。“台湾大学真了不起。MOOC 这么重要的事儿，竟然指派了个副教授负责。不过也只有像副教授这种年轻人，才能把 MOOC 做得好。换成学校领导负责，就做不起来了。”

其实不止年轻这么简单，选择具备未来意识及战略精神的创新性人才作为



负责人，才是MOOC成败的关键。即便他们资历尚浅，但极具潜力，只要提供学习和实践的空间，积累好成功所需技能，便可以代替企业领导者直面企业未来。叶丙成老师在台大开始MOOC建设之初，并非依赖学校的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更多凭借于个人对MOOC的信念、热情与执着。身边其他老师受其感染，对MOOC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最终一系列的精彩课程让台湾大学风靡华语地区。后来叶老师与学生共同开发了在线游戏平台“PaGamO Online”，更是他作为在线教育先行者的又一证明。

MOOC学院在运营两年之后，也选出了自己的年轻负责人——宗唯伊。这是曾就读于中科大的学霸妹子，2011年毕业后在果壳网负责市场推广。2014年，为中国第一辆月球车发声的微博账号@

月球车玉兔让她一战成名。在MOOC学院的两年中，宗唯伊负责了海外平台合作、MOOC奖学金、职业教育拓展等许多重要工作。果壳网管理团队有一个微信群——果壳互黑群，专门用来通知、闲聊以及互相吐槽调侃。那天下午，前任MOOC学院负责人姚笛，在群里通知宗唯伊的MOOC汇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面对团团围坐的果壳员工们，宗唯伊徐徐道出她心目中的MOOC蓝图：“感谢大家，来听我们MOOC学院的项目汇报。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推倒MOOC的围墙》……”

来源：在线学习

记者：潘超

## 杨东平：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高考改革，推进高等教育走向公平，这是自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不曾降温的话题。

日前，教育部发布消息，将出台高考改革方案，推行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和

学术型人才的高考两种模式。根据改革方案，今后对一个学生的评价不再是高考几门科目的分数这么简单，以后的高考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统考成绩”。

这样的高考改革，将会对教育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科学的选拔人才制度改革，能否兼顾到那些贫困农村学生的教育公平？就此一系列的话题，专访了一直从事教育改革研究的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杨东平称，这次的高考改革，不仅仅是高考的考试方式的改变，更是教育理念与理想的变革。未来的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教育系统必须设计出透明可靠的制度

马想斌：高考分类改革出台之后，社会对此异常关心。您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的专家，如何解读这一改革呢？

杨东平：在新的高考制度设计中，比较重要的是实行分类考试，高职院校实行“文化素质+技能测试”的方法，不再与普通院校的学术水平考试“捆绑”。本科院校的考试成绩则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成绩统筹形成，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社会对此次高考分类改革的关注，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分类考试。今后高职院校推行分类招考、注册入学。这就意味着一部分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

生可以提前划拨出去，不用再和其他人一起参加高考、过“独木桥”。

二是多元评价。根据这次改革的要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高考改革是同时推进的，学业考试成绩要纳入高考。所以，今后对一个学生的评价就不再是高考几门科目的分数这么简单，今后的高考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统考成绩”。当然，“综合素质评价”到底怎么评价，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三是多元录取。和考试评价制度配套，今后招生和录取制度将实行“双向选择”。由此，今后大学的招录程序，包括自主招生在内，肯定会和现在的做法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取消了高考在高校招录学生时的绝对地位，真正地打破了“一考定终身”。

马想斌：这次的高科改革将会对教育系统产生哪些影响？

杨东平：高考制度改革，势必触及三个利益不同但又相关的群体，分别是：中学、大学，还有考生及家长。我个人理解，这次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至少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基本价值：保障社会公平；科学选拔人才；通过高考改革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

过去我们的很多教育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往往遭遇“死循环”。比如，大学希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但碍于高考指挥棒，很多中学还是抱着应试教育不放，止步不前。再比如，不少国内名校探索自主招生，给中学留出了一点名额搞校长推荐，本意是想用这点名额来选拔一些有创新潜质或学科特长的学生，结果到了中学，碍于公平的压力，最终被校长推荐的学生还是各科都很优秀的高分生……

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时候，各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条件参差不齐，有时难免会遇到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已经曝光的招生腐败事件表明，捍卫教育公平，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和规范。

根据这一次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求，在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同时启动综合素质评价，这肯定会对中学的管理提出极高的要求，建立公信力很重要。所以，教育系统必须设计出能取信于民的、透明可靠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制度，同时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从而保障考试安全。另一方面，学校在实施具体的评价时，可以汇集各种社会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增强其公平公开和透明程度。

马想斌：那么，对大学来说，又有怎样的挑战呢？

杨东平：到目前为止，学业考成绩采取何种计分方式纳入高考，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根据“三年早知道”的原则，从今年开始，有条件的省份开始推进一些综合或专项改革试点，到2017年总结经验、推广实施，那么整个考试招生制度基本确立并付诸实施就要到2020年。

可预见的是，今后如实行双向选择、多次录取的制度，要综合高中学业考、高考甚至高校面试的成绩，还要组织高校各院系参与、按学院和学科招生，录取过程可能长达数月。再加上要落实信息公开和问责制，高校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根据这一次的政策设计，今后，高校招生录取的权力将从招生处转移到以教授为主的招生工作委员会，而招生处只是服务和执行机构——这也是实现马想斌招生的制度前提。要通过权力的转移、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

对贫困农村，应有补偿措施

马想斌：此前，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屡屡提出，却又屡屡半途而废，原因何在？

杨东平：问题就在于我们国家过去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目标、路径和时间节点，30年来改革都是随机的，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政府也在研究，却迟迟没有出台，而且政府有一种主流声音：高考改革很重要，但是非常复杂，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还不如不改。

比如江苏高考改革，一动之后就是众说纷纭，好坏评价蜂拥而至，改革有很多风险。包括上海复旦、交大的改革，一旦发现有人滥竽充数或者其他问题，马上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改革往往是最好最安全的办法，不管社会压力多么大，高考制度已经被习惯被接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惰性思维是比较大的阻力。“虽然有缺点，但这是目前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声音的潜台词也是不作为。

马想斌：除了惰性思维这种阻力外，还有没有其他阻力？

杨东平：惰性思维就包含了改革阻力的两大方向：一个是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形成一整套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经济领域不一样，这一套东西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经济领域已经完全更新了，教育领域软

件和硬件没有升级，还是1950版，所以惯性特别大。

第二，除了体制性观念形成的障碍，现在多了一个，医疗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情况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十年文革拉平了，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两手空空。今天不一样，30年来已经造就了强大的政府，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时形成了一些相关的利益集团。比如说重点学校，它们都是不愿意改革，改革就会伤害他们的利益，这是非常现实的阻力，是我们改革所需要克服的。

马想斌：您曾提到，整个的招生制度改革设计是从科学的人才选拔角度出发的，所以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选拔应该不包含在此列。为彰显教育公平，需要制定一些补偿性政策加以保障。

杨东平：对的，比如，针对贫困地区，高校可以实行定向招生。国外很多高校在招生时，也都有类似的做法。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注意到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招生，农村生源不断减少。我们在这套考试制度对于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农村学生已经呈现了不公正。让农村学生和从三岁就上辅导班的城市学生公

平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公平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已经非常显著的体现在学业成就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个问题，就需要校正它。像美国大学有强制性的规定要录取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否则，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管理层就会是清一色的白人，会很难出现奥巴马、赖斯、鲍威尔。

往大说，教育公平的原则，首先是竞争性机会的公开平等、一视同仁，然后是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补偿。因此，不仅要清理、取消对农村学生的歧视性规定，取消主要面向城市学生的优惠政策，例如某些高考加分项目；还需要考虑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切实保障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所以，建议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例如规定重点高中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不应低于考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或制定一个必须控制的底线，如不低于50%等。同时，建议监测并公布重点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状况，作为对公办学校履行社会责任和公益性的一种评价、考核。可以想见，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政策保护，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仍将一路走低，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马想斌：那高考的地域不公平，您认为应如何解决？

杨东平：现在高考的不公平存在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地域之间的差异；一个是重点院校在各地招生的情况；一个是加分政策。地域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分省定额的划线录取这样一个制度造成的，在每个省招生的名额是由国家来确定的，大学生只能在本地区接受省属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各省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非常大，所以也导致我们今年全国平均的录取率大概是62%，但是在大城市和有一些省可以达到70%—80%，但是有一些地方只有40%、50%，就是说分数线的差距大。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因为各地招生的总量主要是由省属高等教育规模来决定，就是说地方高等学校多招生就多，地方高等教育是由地方财政来支付的，所以理论上它不会招外省人，只有国立大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我想它应该争取做到逐渐在各地招生比较均衡，但是省属大学主要是招本省学生的，主要是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资源不均衡，因为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较多，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较少，这些方面，增加一些大省和薄弱地区的招生数量是一个方向，但是对总量的改善，宏观改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取消高考不是一个现实命题

马想斌：高考毕竟是对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限制，所以有人提出，什么时候和条件下可以取消高考？

杨东平：取消高考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命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高考，只不过考试的方式不一样，一部分是分散的自主考试，还有一部分国家是实行全国的统一考试，这两种形式都是考试。另外还有的地方考试的方式也不一样，既有统一的书面考试，现在还增加了很多对他的平时学习成绩的观察，以及对其他各种能力的考察，也就是说，开始实用多样化方式来选拔学生，考试形式一直会有，只不过考试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马想斌：除了高考对科目等形式的改革和调整外，在您看来，这种改革的背后，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想？

杨东平：长期以来，我们以“全面发展”作为指导学校教育的工作方针，它在现实中往往走偏为“平均发展”，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上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这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从教育和社

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新的教育方针可改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

教育的价值要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教育明确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人的成长、幸福、快乐是重要的教育目的。这意味着需要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教育既不能以升学率、以数字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也不应将学生视为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扩大，学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需要更加尊重学生的权利、保护学生的权益、体现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

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转为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全体学生，优先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人群的教育，恢复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学校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生活教育”。上个世纪30年代，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针对性，是一种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既

中国化又真正现代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建立“生活教育”，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

践相脱离等基本问题，实施民主的、有用的、活的、创造的教育。

来源：访谈取自《反解社会：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马想斌，刘晨/著，待出版），爱思想网授权发布

编辑：丁香的耳朵

## ■ 北大人物

### 苏勉曾：勉运家国 增臻学术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清晨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了进来，斑驳的阴影投射在玻璃茶几上。茶几下是一摞摞报纸、杂志，摆放得整整齐齐，凑近一看，有《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茶几旁边，九十岁高龄的苏勉曾先生半佝偻着身躯坐在藤椅上，双腿上摊开着一份今早刚到的报纸，他左手微微架着眼镜，右手指在报纸上缓慢地滑动，

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射到地上，勾成了一幅剪影画。

#### 烽火连城兮，求学漫征程

幼年时，苏勉曾的家乡河南时局一度十分紧张，先有军阀混战，后有日军来袭，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时年七岁的苏勉曾才背上书包正式步入学堂，从此开始了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征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从河北一路烧杀抢掠，很快攻到河南。此时，刚在开封上中学的苏勉曾不得不随学校转移到河南东南位于大别山区的商城县，不久，又迁至河南西南的偏远小城——镇平县。乱世中，苏勉曾身如浮萍的状态直到学校迁到伏牛山窝里的内乡县夏馆镇才算结束。“我们当时年纪都很小，身板也瘦弱，没有汽车、火车，只能背着小行李，一天步行五六十里路赶到一个又一个安置点。日子很苦，但是没办法，国难当头，我们无家可归，只能与学校共命运。”回忆起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苏勉曾长长叹了一口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逃难中的求学生涯，特别是开封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涯对苏勉曾有着延续一生的影响。当时开封高中的老师多数是北大毕业的，学校也因之有了一些似北大那般的民主风气、自由思想和学术氛围，允许学生成立各种各样的社团，让苏勉曾印象深刻的有社会科学读书社、文艺社、剧艺社等。当时社团的很多活动多是由地下党直接领导，老师们还经常为学生讲解时政、分析时局。耳濡目染内忧外患的祖国现状，苏勉曾与同学们的思想受到了触动，爱国热情更加浓烈了。这也促使他在1943年高中毕业时，与他在读书社结识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决定结伴离开国民党统治森严的河南，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追寻进步思想。

可是，决定容易，旅途却不平坦。苏勉曾先是一个人走“西安—宝鸡”线到重庆参加了入学考试，在被联大录取后，他便马不停蹄地要赶往昆明。但是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远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什么办法都试了，坐过运货的‘黄鱼车’，也壮胆上过国民党军车的篷顶，一心只想往联大奔！”而时局对这群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有些前程未卜的味道。为了心中涌动的联大梦，苏勉曾甚至在鬼门关里头绕

了一回。为尽快到达昆明，他取道贵州。无奈沿途道路崎岖，多悬崖峭壁，在离贵阳还有二百里地的息烽发生了车祸，苏勉曾被重力甩出，晕死在灌木丛中，后幸得被及时救出，在贵阳休养了一个月才清醒过来。凭着对联大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进步、不怕困难的韧劲闯劲，经过长途跋涉，他最终于1943年底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以前我常和我的一些学生说，你们千方百计费很大的劲考托福去美国，我们那时向往西南联大的那个劲头可一点不比你们差。”苏勉曾笑道。

### 联大共国运，书生奋激昂

1943年，19岁的苏勉曾正式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就读于化学系，开始了他与化学一生的不解情缘。联大学生们属于“公费”读书，国家给沦陷区学生贷金，保障基本生活费和伙食费。即便如此，物资供应仍然十分紧张。在一间间破旧的茅草房、土坯房里，这些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联大的莘莘学子们一面挑灯夜读、精进学术，一面又不得不“兼差”打工，以维持学业不辍。苏勉曾想起当时同窗们“各谋生路的绝招”：有去做家庭教师的，有在云南报馆做校对员的，有在影院当引导员的。苏勉曾自己也做了两份“兼职”：教人英文和在学生浴室里当服务生供水。

当时的西南联大虽然偏居西南，但它始终站在中国社会革命的前沿。即使在这种“半工半读”的艰难条件下，联大的同学也没有忘记关注国家命运。“当时联大有一面专门贴大字报的墙，很多人在上面发表观点，颇有百家争鸣的感觉。”苏勉曾追忆说。大字报多表现进步思想，从对战争形势的看法到对社会局势的评判，不一而足。那个时候，联大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的教授们经常出来演讲，文科系、法学系的教授们也总是侃侃而谈。学生们往往席地而坐，聆听教诲。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苏勉曾参加了历次学生运动。但他笑称自己那时候觉悟不高，“运动过后，我就又回到图书馆苦学去了”。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迁回北平。苏勉曾选择到北大。“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流浪了八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好好读书、搞研究了”，正是

这种单纯的“我为学术狂”的精神，让苏勉曾得以与北大结缘。

然而，抗日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1945年，中国又陷入了内战。当时的北大秉持五四精神，民主气氛浓厚。师生们经常参加反国民党独裁、争取社会民主的运动。他们热切企盼全国的和平，不但抵制国民党政府南迁北大，一些进步学生还偷偷地跑到解放区参加共产党搞革命。受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和学运高涨氛围的影响，苏勉曾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文化工作者联盟，积极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动员师生、北大附近居民迎接解放。1949年北平解放，党组织要吸纳培养新成员，苏勉曾被吸收参加党员培训班，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勉曾看来，如同他加入共产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留校任教也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解放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期，也是苏勉曾在实验室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他跟着化学系的主任钱思亮教授做有关杀菌剂（苯环）的毕业论文，研究目的是使杀菌能力变强、毒性变弱。这个实验要求对氯代苯酚上的第6个位子做很复杂的合成实验，但是受当时条件限制，许多化学试剂都要靠自己去找。为了做好实验，苏

勉曾只能尝试从裂解蓖麻油里取得几种直链醇。他日复一日地埋头苦干，在高温真空裂解下分离不同的碳链醇，再接到苯环的第6个位置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他成功了。1948年，正值北大50周年校庆，学校准备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要求每个理科院系出一篇论文参会，苏勉曾获得了导师的推荐。后来，他又在中国化学年会上作报告，这是他在化学领域暂露头角的时刻。

#### 沉浮几年岁，矢志为学问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北大迎来一片新气象。随后，“破旧立新”“三反”“五反”等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为向科学方向发展，北京各大高校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院系调整。但是好景不长，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各种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了。

1963年北大开始搞社会教育运动，师生被陆续派到各地农村。苏勉曾也被分配到四川峨边县的一个山区公社，带了一个工作队，共十几个同学参加运动。每个同学被分到相应的一个生产队去做领导，访贫问苦、搞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指导生产。当时苏勉曾对上头的做法比较怀疑和排斥，因为实际体验让他觉得农村干部多数很好，并不存在

“四不清”问题。所以，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要尊重当地党支书、村长，切不可高高在上乱指挥。

不久后，苏勉曾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1965年他从苏联进修回来，回国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苏勉曾也曾几度沉浮：先是挨批斗，闭门读毛选；后被派到北京化工厂思想改造，和厂里的工人搞技术革新；最后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农场改造。文革的压抑气氛使苏勉曾深深意识到这种“斗、批、改”的风气是违背国家传统和世界文明的。在被下放改造的过程中他始终不忘克服艰难条件，刻苦钻研，积累经验。他有着“看天上云卷云舒，观庭前花开花落”的平和心态，坦言如果生不逢时，多吃些苦、受些罪、经历些挫折，对一个人的成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管是奔波几千里去上学，还是下乡劳动，又或者是被批斗，苏勉曾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畏难退缩。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九十岁高龄的他，眼里透出的不是惋惜，也不是遗憾，而是历经沧桑沉浮后的恬淡与释然。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苏勉曾的学术研究也迈向一个新台阶。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了解到固体化学这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对国家发展意义重

大，苏勉曾就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固体化学都是一门很新的方向。上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才有人系统研究固体化学，理论上仍存在着诸多困难；而研究固体化学需要的高端探测仪器，在国内也很稀缺。苏勉曾不仅要克服实验条件简陋的困难，自己制造设备，还要不断参考国外最新思想动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讨论，特别是和物理系光学、磁学的教授探讨。固体反应条件通常比较苛刻，90年代初期，他率先将国际上的“软化学合成”方法引入国内并加以发展，在温和的条件下，实现了发光材料、径向梯度折射率玻璃等多种无机功能材料的可控制备。

就这样，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苏勉曾不仅成了将固体化学引入国内的第一人，而且为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议在中国化学会内成立固体化学专业组，由北大化学系牵头组织或协办的全国固体化学学术会议达十余次；同时，北大举办了两次固体化学研讨班，邀请国内同行来座谈，作了多场学术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改革开放后至他正式退休前的二十多年里，苏勉曾始终兢兢业业，将宝贵

的时间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化学实验室。他先后培养了二十二位硕士、十一位博士，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研究论文，出版了三部专著、两部译著。在用于三基色荧光灯的蓝色荧光粉、超细稀土-过渡金属合金、永磁材料和X射线储蓄发光材料的制备方面，申报了四项国家专利。在社会服务工作中，他担任过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发光学分会常务理事等职，担任过《化学通报》《中国科学》等10种学报的副主编、常务编委或编委。

此外，苏勉曾系统研究过稀土氯化物、碱土金属氯化物及二者之间的熔盐相图，确定了稀土氯化物水合物脱水和气相水解反应的机理，为我国稀土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先生当之无愧是我国固体化学，特别是稀土功能材料领域德高望重的领军科学家！”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严纯华不无敬佩地说。

### 学者范长存，耄耋情依旧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生秉持“科学救国论”的苏勉曾对于学术和研究的热爱超乎了常人的想象。“老爷子到八十多岁还在带研究生，天天往实验室里跑。”谈到“学术狂”的父亲，苏勉曾的女儿笑道。

在苏勉曾的学生眼中，他从来都是个“行胜于言”的学者。苏勉曾有着学者严谨踏实的作风，做学术、做人都力求一丝不苟，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近乎苛刻。他给学生们讲授固体化学时，使用的每张投影片均为手写，字体优美、图片规整，常为学生们所惊叹。每当研究遇到困难时，他也总是亲自带学生查找资料、讨论问题，寻求各种解决途径。他的实验技能高超，遇到难度大的实验，学生们不知所措时，他就亲自动手。据他的学生、北大化学系教授荆西平回忆，有一个测试氯气分压的玻璃装置就是苏勉曾自己吹制的。即便是退休后，但凡有学生当面或者电话咨询问题时，他也总是能够娓娓道来，使人茅塞顿开。“先生的谦逊和博学是渐渐成人的我所愈发体会到的特质。”严纯华感慨道。

苏勉曾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把实验室收拾干净，把各种仪器设备准备好，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当日要做的事，安排好工作程序，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一丝不苟地做到位。

“先生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课题组的同学们。因此，我们这个课题组出来的同学，都好像带上了这样的印记。”苏勉曾的学生、北京大学

校长林建华在回复记者的邮件采访时这样写道。

退休后的苏勉曾除了依旧关心固体化学学科的发展外，也重拾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爱好。他喜欢看书，但凡社科类、文学类的均有涉猎；兴致来的时候也喜欢唱两首。“老头年轻时候是合唱团的团员，退休后也一直在北大教授合唱团呢。”苏勉曾的女儿说。除了看书、唱歌，苏勉曾还喜欢照相和滑冰。“我的生活可不是只有化学的，但是本质上讲我还是最喜欢化学。”他“狡黠”地笑了笑。

说到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北大，苏勉曾有点激动。他说自己很喜欢北大，以作为北大人而自豪。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是他所推崇的。“我在学校搞什么研究，开什么课，带什么样的研究生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很自在。”

当记者要求他为年轻的学生写一段寄语时，他笑道：“谈不上什么寄语与殷切期盼，我想和年轻学生分享的无非是研究学术数十载的心得，那便是甘于寂寞，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如果能将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同国家社会的需求充分结合起来，学有所用，那就更好了。”

苏勉曾的一生虽然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但他始终以豁达乐观的心态，勉励自己，将个人命运系于家国。他对学术和科研的热爱是浸透到骨子里的，他视所有的艰难困苦为“曾益其所不能”的宝贵食粮，也因为如此，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并最终攀上了学术的高峰。（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龚玉婷）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王颖霞、卢英先、王菲等老师在核对本文专业知识方面给予了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 记者手记：

第一次接触苏勉曾老先生是打电话时，电话那头声如洪钟，先生九十岁高龄却难得耳聪目明。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家很快答应采访并约好时间，嘱咐我将采访提纲提前发给他。等到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先生拿出几张文稿，上面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令人感叹。

先生的回答常常富于逻辑，简单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回答问题时也非常的亲切和蔼，儒雅谦逊，颇有长者之风。

第二次登门拜访向先生索要照片时，先生拿出了一堆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照片一张张给我们找。我在先生旁边，

听他回忆一个又一个出国访问、做实验的故事，仿佛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先生是如何带头建设我国固体化学学科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先生的生平，我给他的几个学生都发了邮件。令我诧异的是来信多称其为“苏先生”而不是“苏老师”，盖“先生”二字更能体现他学识的渊博与学者的风范。

采访中先生多次提及自己艰难的求学、工作岁月，感叹今日的学习生活环境较之他们那个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善。他说他很羡慕如今学生的学习条件，强调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都是有赖于国家的培养和家庭的抚育的。自己取得的成就也是与国家有关，绝不是单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达成的。他说：“我认识到这点，要记在心头，与同学们共勉。”

在领略了先生的风骨与精神后，使我更坚定要写好先生的“人物小传”。正如先生的学生严纯华老师在复信中写道的那样：“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在当下浮躁的气氛下，系统地挖掘和报道代表北大根、北大魂、北大神的一批老先生，十分急迫而紧要。”

但愿更多的同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君子志道”栏目了解更多的北大精神，

并将之传承下去，我想这也是先生的愿望吧。

#### 人物简介：

苏勉曾，祖籍河南信阳市，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至1965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主攻无机化学、固体发光材料化学。长期从事稀有元素化合物性质、钍和稀

土氯化物与碱金属氯化物的相互作用以及X射线发光材料的合成与发光机理研究。主持研究的科研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甲类）二等奖（1995）”等。著有《系统无机化学》《稀有元素化学》《固体化学导论》《发光与发光材料》等。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张平文：一念为教 一生为学

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椅子后绕着两株高高的绿色盆栽。不大的沙发上堆了些衣服，三双运动鞋靠在墙边，与其说这是张平文的办公室，不如说这是一个小型生活区。桔红的大柜子独占了一面墙，前三列都是书柜，里面摆满中英文书籍、一些奖状和奖杯，还有几个小装饰品，“都是学生送的”。张平文打开最后一列柜子，柜子内侧镶了一面穿衣镜，他拉起衣架上的毛巾擦擦脸，扯出一条领带，对拍照的记者说：“戴这条怎么样？”

“从周一到周日，全在办公室里。”从求学者到教学者，在北大待了31年的

张平文，俨然已经把学校当成了第二个家。



### “走不一样的路”

张平文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数学的热爱和天赋，农村出来的他曾在湖南省数学竞赛中名列前茅。1984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了这位高考全省前十的18

岁少年，张平文从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基础数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十分刻苦，曾于一个学期选了七门专业课。面对如此好学的学生，本科课程怎能喂得饱他，于是，名列前茅的张平文在大四开始选修研究生课程。

本科毕业后，近一半的同学都打算出国深造。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开销，家境贫寒的张平文决心“走不一样的路”，在国内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为了让自己所学能“真正有用”，他选择了攻读计算数学的硕士和博士。

在张平文看来，计算数学正是一门“有用”的学问。计算数学研究算法与模型，最早应用于国防，随后进入工业领域，天气预报的数据预测和出租车导航也离不开它。“计算数学的成果都藏起来了，但正是这些算法和模型在背后起到了支撑作用。”张平文笑着说，身子微微后仰。

当时的北大还处于学制改革初期，学生读完硕士和博士需要花费六年时间。为了尽早完成学业、工作养家，张平文找到了应隆安教授，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导师，并表示要在四年内博士毕业。面对功底扎实、踏实肯学的张平文，应教授欣然答应。1989年，张平文用一年的时间学完了硕士三年需学的课程，并

顺利考上博士。博士的课程在10月开学，但张平文6月就到了北大。夜晚的46楼几乎没有人，他就在静悄悄的宿舍里一个人看书，“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嘛，夜里有时候害怕，就把收音机声音开得特别大。”一本内容深奥的专业书，张平文花11天就能看完，他每天晚上都去应老师家，和老师讨论书里的内容。

有了本硕五年积累起的丰富知识，读博期间的张平文做起科研来如鱼得水。博士一年级，张平文拼命做学问，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后，他跑去问导师：“博士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毕业？”导师说：“你现在的水平就可以了。”于是张平文又兴冲冲地找到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表示要毕业，但老师说：“不行，你同学硕士还没毕业呢，你着啥急呀。”最终，张平文如愿以偿，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在四年内读完了硕士和博士，成为了北大数学系“博士早毕业”的第一人。

1994年，留校教学两年后的张平文评上了副教授，再过两年评上正教授。1998年，32岁的张平文成为了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主任，当时系里有8个人，张平文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 “找到正解所在”



担任系主任之后，张平文发现，学院一届 160 多名本科生中只有 7 人愿意学习计算数学。“7 个人可怎么开课啊！”张平文急了，当天晚上带了几个比较活跃的研究生，一间一间地敲开学生宿舍的门，拉着他们谈计算数学的前景，终于把 7 人的队伍“忽悠”到了 20 余人。

“劝学”一直持续了三年，在第四年时，张平文再也没有“闯”宿舍了，他找到了问题的“正解所在”。换位思考之后，张平文发现，相比于基础数学、概率统计和信息科学专业，同学们对计算数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专业是学啥的，学出来又能干嘛。”其次，计算数学很难，不仅要熟练操作计算机，而且对数学的要求也很高，甚至还要对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有具体的了解，这就给同学们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找到了问题根源，张平文做出了定位：不求人数求质量，每年有 20 个人就已足够，但这 20 个人，必须是最优秀的学生。”

基础数学已有几百年历史，学习者能体会到它的美感，而计算数学存在的时间不长，偏向实际应用，要让学生体会到计算数学和基础数学不一样的地方，必须进行改革。下了决心之后，张

平文把主要的几门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全部修改了，他身兼数职，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联合同事编写新的教材。6 年后的新教材中，每一个章节后面都加上了应用型的上机习题。



张平文和计算数学系同事们一起编写的全新教材

教学体制改了，可怎么才能吸引学生呢，张平文又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和别的教授“担心学生出国会造成人才流失”不同，他反其道而行之，尽全力帮助学生完成出国梦。张平文每年为同学们开设一次出国的讲座，直到今天也从未间断。对于最优秀的学生实行“定点推荐”，让他们能直接申请最想去的学校，给别的同学留出更多机会。此外，张平文还负责了学生和国外学校的联系，建立起双方沟通的桥梁，说到这里，张平文兴致勃勃给记者看他为大四准备出国的学生们建立的名为“飞跃小组”微信

群，群里的13个人每天都热烈地讨论申请出国的事，张平文也时不时在群里为同学们“排忧解难”，并让自己成功出国的学生为他们介绍申请经验，完成“信息的延续与共享”。

张平文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提高国内的学科建设水平。他请了很多海外学者来学院任教，让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同时开展本科生科研，把手上的项目交给本科生来做，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做基础数学，天分和勤奋最重要；但是应用数学，最重要的是综合能力。”

不仅是出国，如果自己的博士生想要找研究方面工作，张平文也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从单位到工资，安排得十分细致，就像一位爱护着孩子的父亲。作为教师的张平文和同学们的关系非常好，刚刚入职的他和学生“因为年龄相近，所以像兄弟一样。”而现在，尽管和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大了，但同学们也都能感受到张平文对他们真挚的关心。

有了好的老师，再加上好的机会，同学们自然热情高涨，想要跟随张老师做研究。计算数学专业得以快速发展，师资力量日益强大，学生中涌现出一批科研人才，并在多种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这份对学生的爱护和关心，张平文在计算数学学

科建设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因此他也被评为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2010年获得“北京市师德标兵”等称号。

### “做感兴趣的事”

张平文做起事来十分专注和投入，对于1999年之后的科研，他甚至用到了“拼命”一词。张平文认为，理科的研究介于工科研究的条理性与文科研究的跳跃性之间，十分注重逻辑。除此之外，科研还需具备两个素质，一是兴趣，二是毅力，年轻人应该勇于尝试，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再对其进行研究：“有了兴趣和毅力，才能长期坚持下去而不觉得累，最终取得成功。”

对于从事科研的人来说，研究过程从来不会很顺利，一次失败，就是一次徒劳、一次希望的落空，在研究者的兴趣重新填满这种空虚之前，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来担负这一切。“失败的例子太多了，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尝试和失败才可能获得成功，而成功的喜悦就是那么一刻”。

一晃三十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平文从血气方刚的学生变成了教书育人的老师，他对生活的看法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年轻时的张平文把科研看得十分重要，觉得博士生留在学界做学问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现在的张平文改变了自

己的看法：“人的路都有很多条。每个同学都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良好的心态最重要，其次是身体，第三个才是工作和学习，千万别倒了次序。”谈到这些年的经历，张平文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人”，因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总是有人不求回报、不考虑得失地给予他帮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要做一个给别人带来正能量的人。”

在生活中，张平文喜欢打桥牌，还曾经代表北大教工队参加过“京华杯”的桥牌比赛。但为了多花时间在科研上，他已经很久没有碰桥牌了。“总要有所舍弃嘛，”张平文说：“这些年在学科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方面，应该说做了些成绩，这是非常自豪的事。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提到家庭，张平文的话里充满了温情，一念为教，一生为学，在教学上

无私地奉献着青春的张平文，也藏起了一份厚重而深沉的爱。（文/新闻网记者朱垚颖 刘之湄）

#### 【人物简介】

张平文，男，1966年7月生，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1992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研究，他在复杂流体的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移动网格方法及应用、多尺度算法与分析等多个领域开展研究，在 JAMS, SINUM, PRL 等杂志发表论文 100 余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冯康科学计算奖等多项荣誉。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 学者谈读书

### 楼宇烈：读书与做人演讲实录

今天约我来讲的题目叫读书与做人。题目有两个词，一个读书，一个做人。中间加了与字，我想这个与字可以改成等号，读书等于做人。为什么这样讲，我想先读一段话。

这是清初的一位著名学者，叫 ，给儿子的信中写“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方是读书之法，如此方叫读书人；如果不是在自己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则是不读书人。”所以读书与做人是一回事，不是两件事。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朱子家训。他也写过一番话“读书先论其人，再论其法。所谓法者，不但记其章句，而当求其义理。所谓人者，不但中举人、进士要读书，做好人尤要读书。中举人，读书的重心是在章句上。我们现在小学，背答案，也就是在章句上。而做好人的读书，则究竟在其义理。先儒谓今人不曾读书，如读论语，未读书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

人读书是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否？

做一件事，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之浮浮泛泛，记得几句古书，口上说几句雅语，不能算读书。

所以古人已经告诉我们，读书与做人，它是一个道理。读书是为了做人。

不管怎么说，首先要讲一讲，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人，我简单地归纳了一下读书的目的。

#### 1. 通晓人道 明白事理。

《淮南子》里有一句话，我常念给同学们听，都说太符合现状了。它讲两个字，一个仁，一个知。说在传统文化中一个人具备了知、仁的品格，就可以说是一个圣人。怎么才叫知、仁呢？淮南子里说，“遍知万物，不知人道，不可谓知；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这是两千年前说的，是不是和现在也很像？我们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人事；我们爱各种生物，就是人类可以互相杀戮。

所以读书是为了通晓人事，做一个真正的人。我们学习，读书，最根本就是为了做人。问题都是通过人来观察他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根本特点就是一切问题都是和人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动物间的许多行为，可以体会到人是不是应该比它做得更好。不是常常讲一句话么，“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所以我们能看到连禽兽都有这样一种行为，人能连禽兽都不如么？

这时科学家就会反驳：只是自然的条件反射啊？这是根本不懂人文，人文的思考就是要在这些小事上体会做人的道理。清华的校训，天行健，地势坤，从天学的，从地学的。天地是那么广大，那么包容，天在上，地在下，万物在中间郁郁生长。天地非常包容，从不会嫌弃。所以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之心最广大的，我们人也应该学习。

所以我们的文化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来发掘、学习它对人生有何意义。不是光是简单的观察。都知道我们的科学，称为“格致”学，格物致知。程朱理学就是说是去考察万物的道理，这是我们向外的考察。那我们考察了以后，要能得到些什么？不是说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要考察了之后，知道

这些变化对于我们做人的道理。它都是关联起来的。

所以我们学任何学问，都不应该把它看作纯粹对象化的东西，而要把它们和人生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读书首先要通晓人道，明白事理。

## 2. 读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完善人格。

不是光懂得道理就可以。学一句，就要督促自己按照这样做。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地使自己有所变化。原来读书之前，不通晓人道，但学了之后，就应该根据我们所学的事理，改变自己。所以知和行一定要结合。光知了，不去行，可以说毫无意义。一直讲，让孩子们读弟子规，很好啊，因为里面讲的都是日常生活应该遵循的言行规范。其实不光是对弟子讲的，老师，成人也要这么去做啊。我们从儿童、少年、学生时期就要养成这些规范。不光弟子要这样做，大人也要这样做。学之，光倒背如流就行么？不行。学一句做到一句，学两句做到两句，能达到十个要求，我想这个人就不错了。他的气质会发生变化，人格会不断完善。

中国文化讲的是为己之学。按今天说法，字面上，古之学者为自己，不好，但它不是这个意思，为己是不断地完善

自己提升自己，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是问问自己学了这些东西，人格有没有完善，气质有没有变化。荀子讲，君子之学，美其身也，不断变化自己的人格。不是学了之后掌握了资本，可以和别人交易了，不是这个。所谓小人之学，是为了财，可以去和人进行交易了。所以荀子曾说，人生来其实没有多少差别，尧舜和 其实本来没有什么差别。那为什么？主要是后天的习染，教育。所以根本上来讲，后天的教育和自我的学习，才造成了人之间巨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后天说性善性恶，但他们都承认人是可以变好、变坏的。论语里说，性相近，习相远。所以读书重要，读书对于我们人格的完善，德行的提升有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读书和做人不能看作两件事。当然这是相对的，不是说 不读书的人就不是好人，读了书的人也可能是坏人。

**3. 读书还有第三个目的，是拓展知识，学习技能。**

不是说了前面两点，就把这点丢了，但这三个目的是有次第的，不是等同的。先通晓人道，然后我们实践，然后拓展。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首先要至于道么。人都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其实人做一件事，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胸

怀。只是个人做这件事，还是为了国家呢。所以我们立志，要志存高远，决不能只为了个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大志，为国为民，有了这样的大志，才能做大事。

解放前期，很多科学家在国外。那么他们为什么想尽办法要回来呢。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有这样的胸怀，再艰苦，再难以攻克的堡垒，也能承受。没有胸怀，一碰到困难就退缩，就受不了了。所以志向要大，要志存高远。但我们必须要回到脚下，志存高远，行在脚下。不能夸夸其谈，不去做。

有了这个志向，就可以不断地创造。人的可塑性很强，并不是学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但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他不会去担当的。所以读书就是要让我们立下志向，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人格更加圆满。

**那么读什么书呢？**

有句老话“开卷有益”。话是这么说，但没有鉴别能力的时候，不能拿了什么书就读；有了鉴别能力了，就什么书都可以读。但是我们也要选择，不能什么书都去看，那可能就被误导了。而且可读的书也是多得不得了，现在的图

书分类法里，把所有书都分为几百类。那么我们从哪里入手？我倒觉得我们古代的分类，简明扼要。经史子集。它对每一个所要传达的信息，做了一个很好的归纳。

### 1. 经

经书，经典，就是经常要阅读的典籍。它有一个长久的生命力，经就是常。经部就是指那些常用的经典，这是在一个漫漫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慢慢发现有一些典籍，道理有其恒常性，超越时代，特别是关于一些做人的道理的论述，只要是人，它就有启发，就有意义。所以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根源性的典籍。经过了很长时间发展。

我们在先秦时期就提出六经的概念。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个方面的经典。这是最初有这个的概念，但还未完全形成。到了汉代，才基本上奠定了六经的地位。这也是有一个过程，过程中乐经就纳入到了其他经中，两汉时就叫五经。因为当时还是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进行归纳，所以提出五经概念。这里面告诉我们最基本的人道、天道、地道的问题。所以我们读经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目的。明白天理，通晓人道。做人应该怎样做？言

行举止应该遵守哪些规矩？现在人很烦规矩这个词，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人们羡慕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要忘了不逾矩啊。西方也说，我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那么礼教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遵守什么规矩。其实是告诉我们，你要遵守这些规矩就有天大的自由，否则你就没有自由。

父母，生而要养，养而要教；子女，就要去孝敬。我们常想子女孝顺自己，自己不去孝顺父母，行吗？不行。我们怎么对父母，子女就会怎么对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身份，按照这些身份做事，那是最愉快，最自由的。所以读经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当下应该怎样去做。否则就是不符合身份，那就要碰壁。所以经的核心就是要强调礼。

所以易经里就说天地变化，那么我们人也要遵守这样的天地变化。冬天光着膀子，行吗？所以读经，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事的道理。不能制造人之间的冲突、隔阂。如果社会上人都能够尽伦尽职的话，那么一定是一个很和谐的社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这个，你在什么位置，就希望你尽这个位置的责

任。而如果认为这是一种束缚，不按本分，那社会就乱了。

所以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对很多的问题偏见是

就像礼教，是自然法、习惯法，是我们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不需要人去强迫的，是社会的基础。我们常常说一个问题，子女要多去看一看自己的父母。后来有人说，真是没办法，是不是要把这些定到法律条文里。我说太丢古人的脸了，这是自然的，不是人去强制了。我们连最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都不去遵守了，那还叫中国人么？

所以礼，就体现了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然，和人有什么关系。跟人没有关系，研究它干什么啊？现在听发现天文上什么星，几万年也到不了，那研究它干什么？不研究也不会死人（笑）。所以把人放在整个生存环境里。

所以经里告诉我们天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古今之间有什么变化。后来经书要扩展。儒家经典来说，加进去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后来礼经，加了礼记、周礼。十一部了。春秋呢？也加了有左氏传等传，这就是十三经了。

道家呢？有啊。道德经啊，庄子啊，大家不要小看庄子，大家生活中的成语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庄子，这些寓言里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对我们做人有启发，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也有重大作用。比如我们说读书不是为了辞句，而要把握它的思想。文以载道。把握了道之后，管它什么文字呢。当然这说得绝对化了，文字不优美谁读。但西方觉得中国写意是不只重视意，像西方抽象，随便画上几笔，你去猜去吧。而中国的写意不是不要形，而是不要停留在，形上。得意忘言。最早是庄子里讲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语言是传达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得到思想，它语言怎么讲的，就不要斤斤计较了。所以庄子后来道教里称为南华真经。

汉代还有一部经书黄帝内经。千万不要把它单纯地看作医学的经典，中国的经典都是联系的。内经里天道人道都有，只是比较偏重人方面。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仅是治病，治理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人说中国人没有科学思想，不是的。是科学的标准不对，演绎、推理就认为是科学，直观、感觉、体悟得到的经验就认为是不科学了。这说到了梁启超了，他对阴阳五行是彻底的批判。其实我们今天发现了，理性可以认识世界，感性同样可以去认识世界。而且有时非理性的直观直觉，更接



近事物的全貌。而理性只是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好像只有理性的归纳，推理才是科学的，就是不科学。其实阴阳消长，五行生克 其实揭示了社会最深刻的道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凡事必有合。你们看到我只有前面没有后面（笑），可怕了。有阴必有阳。所以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啊，中国早就提出了这个道理了。老子，反者道之动。我们把自然、生活中的现象以五个方面加以归纳，金木水火土。然后看有什么样的关系，希望达到一个整体的平衡。社会上部门，相互之间也有不同的关系，如果搞错了，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道理管理社会、认识世界，有什么不可以啊？它用最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

怪不是西方一些物理学家，说中国文化的语言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最博大的自然现象。所以李约瑟说的是个伪命题，没有认识到直观的科学性。所以我们读经书，可以认识到方面的道理。

## 2. 史。

读史书，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说。。。中国的史书是最最完备的，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样完备的。因为中国人认为我们要搞清当下的情况，一定要以历史照

一照。很多文化精神，也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到的。比如说，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第一位，这样一种文化理念，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来的。夏那么强大，最后完蛋了，就是自身德行不够啊。商多兴盛了，到了纣王，又完蛋了。所以周总结，不能靠天命，要靠自己的德行，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每个朝代，稳定之后，都必然要修前朝的历史。

但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所以看我们的历史都很完整。现在要找天文学最早的资料，也要到中国的史书里找。所以读了史书就让我们懂得古今是怎么变迁，朝代怎么更替。通古今之变。我们要懂得历史，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有个大问题：看不起我们的祖先，觉得没有祖先现在也可以，觉得现在的人比古人聪明的多，绝对相信一种理论：进化论！

章太炎就说了，善进化，恶也在进化。我们不要看不起我们的祖先，今人的成就是 是在古人的基础上取得的。要尊敬祖先，我说尊敬都来不及。现在人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化，但至少 16 世纪前中国文化在世界是领先的。无古不成今。再有句话，观今宜鉴古。

如果我们有这样两个信念，不至于要把传统都完全抛掉。历史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经验也是一步一步总结来的。我们今天很多问题就出在我们把很多历史给断灭了。我们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文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改造的，哪些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比如说我就认为我们必须要坚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特质。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如果放弃，跟着科学特质去走，就永远只是跟着别人。

所谓人文特质，就是注重人本身，而又把人放在天地之间。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西方中世纪接受了中国的人本精神，去批判神学，发展出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冲昏了头脑，觉得人的理性无所不能。

最初的反思就在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资源和财富的争夺。为了争夺，相互杀戮。人还是失去了自我，变成了物的奴隶了。所以西方思想家又提出，要高举人本主义。而中国一直是人文主义，一直没有走偏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人文主义是西方传过来，不知道这是中国的土特产。而且西方的思想里夹杂了大量的人中心主义和科学万能思想。所以希望想怎么把中国的真正的人文主义发扬出来。

### 3. 子书。

游百家，增智慧。子书里主要是那些带有思想性的，哲理性的，科学理论性的。这些都收在子里。这里要说，中国的文化不是为了增长我们的知识，而是要增长智慧。知识是死的，静态的，智慧是活的，动态的，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我们常说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年轻里很相信这句话。后来经过多年工作的经历，坎坎坷坷的人生，才体会到啊，智慧才是力量（掌声）。你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知识，越学越不明，越学越混乱。无知者不畏啊，什么都敢说，你有了智慧知道怎么去运用后，不敢说话了。

像章太炎啊，都说荀子思想，比孔子、孟子的思想都要深刻。当时人就说，荀子思想，深度、广度远远超过了论语孟子。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把诸子的思想重新建构，刚才提到的阴阳五行，就是董提出的。一年四季，就是最直接的道理。你不能说这个不对，这是描述的这个事实啊，怎么不对？我们看

到的，体会到的，这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学是学智慧，不是学死的学问。所以读书啊，要活读书，读活书，才能读书活；否则死读书，读死书，一定要读书死的！

#### 4. 集部。

所以读集部我说是长见识、养情性。在长知识的过程中不断陶冶我们的情性。那些文学家，从自己的生活中总结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可以帮我们长见识。中国的文学艺术，无论何种形式，最根本的道理还是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集部是让我们从各方面体悟自己的人生，更艺术地体悟人生。所以经常建议，多一点业余爱好，把人生搞成艺术的人生。只有丰富、艺术的人生里学习人生的艺术。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学工的，容易陷到定势里去。所以我们的学生社团，各种，多好啊，让我们在丰富的艺术当中学习人生的智慧，增长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们传统文化的分类，还是很简明扼要的。

其实我们真正把握了深刻的道理，就可以应用所有方面。苏东坡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化，其实充满了要用你的智

慧，把这样一也的道理用到万事万物上去，这才是创造啊！

我们讲科学日新月异，为什么日新月异？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没有通这个一理。今天看到这个事实，以此定公理，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很好啊，但走着走着发现不够用啊，马上我们换一个前提，创新了（笑）。是不是？科学的假设和前提是不需要证明的，我们说这个叫创新。

其实这是局限的，我们把握的是整体。创造性在运用中去把握，运用到哪里去，运用也可以各出其招。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我说不，真因为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运用要落实。我们是在运用中创造。

标准化，麻烦了，任何个性都没有，让我们的孩子都变成背标准答案的孩子。我们难道只是要做这样的么？我们需要培养人根本的个性啊，比如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福是可以变成祸的，祸也是可以变成福的。所以创新。是啊科学发展到今天，多少变化啊，可它还没有深刻的把握宇宙的整体规律。当我们把握了宇宙的整体规律，我们把它运用到各个方面去，这就是创新啊。所以读书不要读成书呆子，不要

成为读书的奴隶，要做书的主人，智慧的主人。

我们读书最根本是要能得其意，举一反三。清代学者写过：好书不厌百回读啊。我们读这个好书，得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我接了一句 精义勤求十载功。我们现在做学问，常常是把简单的工作搞复杂了。其实啊，大道至简，真理平凡，没有那么复杂。可是我们跟你们说最简单的道理，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学佛，问怎么学，都觉得有什么深奥的道理。我说你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就是修行。觉得，什么也没说啊

所以做好本分，平常的事情，比你做一些玄妙的事情，难得多。万物的关系，用阴阳五行构建相互的关系就很清楚，也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两面。所以不要太理想主义，不要想社会上恶的事情都去掉。一个社会永远是善恶的，美丑的。我们是要达到平衡，平衡不是 50%对 50%。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和谐，你迁就我我迁就你，不叫和谐，你尊重我我尊重你才叫和谐。我们现在理解很多就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

平等，就是都做一样的。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天下没有完全相

同的树叶，那有完全相同的人？自己明明不可能，非要说我就要和你一样？

我不是说宣传不平等啊，而是说怎么样的平等？智能都很高，那也有可能这方面的高，那方面的高。我比不上霍金，霍金也比不上我。所以真正的平等是把每个人的智能体能发挥到最好，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格的平等。不是压制你，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特长，这才是真正的成功。现在我们学习别人的，即使到了顶点，内心痛苦得要命，成功么？不成功。

所以学啊，就是一个思维的问题。人和人之间有差异，各种差异，明摆着的道理，一看就看清楚了，不需要理论推演么。各种学术

西方现在非常盛行一个研究：人有没有前世。用大量的方法，统计出来结果，至少有四千的人知道他的前世。通过这个证明人是可能有前世的，甚至有人说人就是有轮回的。那这种学说，我看也不用反驳他。可是能提取出一个普遍的东西呢？只有 4000 人嘛。科学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局限的普遍性，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数据。通过个体推演到全体，这种我认为是相当可怕的。大数据时代，我觉得是相当可怕的。机器人，有了机器人还要我们人干什么？人还找不到工

作呢。有些危险的工作可以用机器人来，但推广所有方面是很可怕的。看病网上看就行了。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要多做一些化繁为简的工作。让一般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不是让他摸不着头脑。

### 最后想谈谈读书的次第。

中庸里告诉我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

审问，现在还在用，审问犯人。书就像犯人一样，弄清楚。不耻下问，不要觉得丢脸，每个人都有长处、短处。所以论语当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慎思，就是要认真的思考，要想明白。论语中还讲了，君子有九思，一言一行都要想。

然后呢就要明辨，分辨是非，分辨疑惑，分辨事情该做不该做。这是明辨，不是说就跟着去做而不思考。

最后就是笃行，身体力行。古人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很明白的做学问的次第了，我们现在只有把这些搞清楚了，按着这些去做，就很不错了。

三达德：知仁勇。博学近乎知，不把自己封闭起来，活到老学到老，再教育终究要开启这样的智慧。

什么叫任？中庸里面将，力行近乎任。既要学也要行啊。

什么叫勇？知耻近乎勇。有羞耻心，知错必改，就是敢于面对修改自己的错误。这要有很大的勇气。老子里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现在似乎战胜别人就叫强人，其实战胜自己才叫强。人贵有自知之明，更贵有自胜自强。

来源：微信公众号 净莲花

编辑：丁香的耳朵

## 熊培云：在一个语言上自相残杀的年代，我们读诗

文学帮我们构建起一个意义世界，与现实平起平坐。在许多人说文学死了的年代里，有人却在逃向它。这个人，正是用一直用思想撼动中国的熊培云先生。

在他的身上，理性和感性并不冲突。情怀与真相流淌在诗歌里，与严肃的学术著作、时政评论同根同源。肮脏的语言始终拒之门外，吟诗的英雄虔诚、柔软而宽广。

喧嚣的九十年代尘埃落定，如今人们重又开始读诗。“寻找一种适合我的表达方式，是一件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带着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熊培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重温八十年代诗歌之归来。

沈星：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诗歌又是很细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熊培云老师，他消失了很长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带给我们一本诗集，我想这个下午不光是我，很多朋友都会问题要问熊老师，我想他也是准备好了的。今天到现场的，还有资深媒体人，新京报传媒与研究学院副院长朱学东先生，他是著名的“抄诗家”，如果关注他的微博，就会发现他不知是为了练字、静心，还是纯粹热爱诗歌，每天晚上都会抄一首诗；著名的诗人、作家大仙；以及著名的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当然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花园般场地的字里行间书店，还有凤凰网读书会的各位同事们，感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聚到一起。

在每位嘉宾轮流发言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读诗的环节，《我是即将来到我的生活》这本诗集里面有一些段落很短，如果读者朋友们有想参与朗读的，也可

以试一试。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熊老师，听他讲讲过去的两年他都在干什么。

#### Talk 1:

熊培云：文学的语言构造出一个平行的世界，搀扶你走到天边

谢谢沈星，我今天特别请沈星过来，其实是有渊源的。我为《思想国》那本书做宣传的时候，沈星在“大家书斋”里采访过我，之后我们互相添加了微信。我发现她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些非常诗性的语言，转而就想，我自己写评论写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把诗歌丢掉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沈星勾起了我重新写诗的欲望。沈星非常有诗人气质，后来还用她非常美丽的嗓音读了一些诗歌给我听，所以今天我对她的到来满怀期待，期待她能够读一读我这本诗集里的诗。

刚才沈星问我过去这几年在忙什么，其实我还是老样子，思考、写作、积累素材等等。不过一些时评类的东西写得比较少了，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状态有关，该说的话大概都已经说完了。

我在《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的后记里提到了叶芝，叶芝说过一句话：“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发明了辩术，在与自己争吵中创造了诗。”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我写评论的时候是在与自

己——而非别人争吵，我并不想说服别人，证明我是对的，而是想让自己明白一些事理。写诗的时候，我也不是在跟自己争吵，而是在聆听自己。争吵讨论的是事实概念，而写诗或者说诗歌本身带给我的是意义。

翻开《诗经》，我们会觉得汉语多么美好，看看那些诗意的词汇：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使用这样一种语言，我与有荣焉。但是，今天的汉语，让我有一种想逃亡的感觉。当我打开刷微博，看到满屏都是脏话和怨愤、是语言上的自相残杀的时候，真的感到非常痛心。可是，我们是有过《诗经》的民族，我们是有过诗意表达的民族，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也有权利去要求精致的语言。我们需要诗歌，我们需要意义，我们需要生活，我们不光需要面包，还需要玫瑰。

对我自己而言，诗歌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线索。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是诗歌，我在小学初中时代读的课外书就是诗集，高中时代又赶上了 80 年代的诗歌热。那时候我读泰戈尔、雪莱，泰戈尔的一些诗对我理解自由的理念很有帮助。“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这是对自由非常好的诠释。

后来我读《雪莱抒情诗选》，读到杨熙玲对他的介绍，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在平凡人中间生长，有一颗泛爱大众的心。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我也是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灵魂的生长从诗歌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受恩惠于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新诗集的名字《我即将来到的日子》，就来自那部小说的结尾。

作为 80 年代的遗民，我有一种匡复天下的理想，但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过得非常灰暗，听的歌曲也很忧伤，大学生活是大路迢迢，海角遥遥，校园是天涯，自己走在里头，孤零而遥远。

我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做心灵的《圣经》来看，里头有些话非常鼓舞我。文学的语言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平行的世界，它可以搀扶你走到天边。小说里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想播撒阳光，首先得内心有阳光”，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想多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是一个内心充满了阴暗情绪的人，我连自己都无法拯救，又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

这本书让我脱胎换骨。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对于我个人来说，有恩于我的东西是诗歌，是小说，是文学，它们让我的灵魂得到非常好的成长。我愿意向文学回报，把从雪莱、罗曼·罗兰这些作家、诗人身上获得的美好，留存在自己的文字里，也希望能把这些美好传递给大家。

#### Talk 2:

大仙：现在的诗歌发展凭借的是网络推动，不能叫“复兴”

刚才熊培云老师说起 80 年代的诗歌热，我深有感触。我写诗也是在 80 年代，那时候，40 年代末、50 年代出生的人办了一本文学刊物，叫《今天》，是北岛和芒克发行的，对我影响很大。我们那时接触的大都是郭沫若那种政治性的诗，看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震动程度可想而知。那大概是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伊始，大量西方诗歌涌入国内。我在书店买了很多外国诗人的诗选，看得非常入迷，后来就开始自己写。

当时我们写的应该算地下诗，就跟初期的摇滚一样。官方不给我们发表，说我们的诗是“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写的人越来越多，掀

起了诗歌浪潮，官方刊物逐渐认可了，一些诗就能发表了。那时候发表一首诗很便宜，20 行算一千字，一千字得 15 块钱。当然王蒙、黄永玉他们一首诗好像都能拿一百块以上，我们这些人一首就二三十。

那时候物价很便宜，一个月生活费十块钱足够了，我们拿到稿费基本就是去喝酒和买书。当时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就是现在东方广场旁边的新华书店）二层有一个外国诗歌的柜台，我们这些“诗歌青年”就在那里买书、看诗、互相交流。下午一般去那儿，晚上就去沙滩的都乐书屋。

但光写诗还不行，也不容易写好。正好西方的现代思潮涌入，当时最受推崇的是萨特、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荣格和弗洛伊德，我们一块儿聊哲学和思想，那个圈子就大了，不是纯的诗歌圈了。那会儿气氛很单一，大家也不想着挣钱，我当临时工一个月工资三十元，也觉得很富裕了。我在家里住，没有房租，吃饭靠父母，没有经济压力，主要精力都花在诗歌、文学方面。

三十年过去了，诗歌经过 90 年代的冷淡后突然又爆发了，但现在的诗歌发展靠网络推动，还不能叫做“复兴”。从前，我们得请编辑吃饭，跟编辑混得



特别好，才能发表自己的诗。现在的诗人写诗不求发表，直接上传到自己的博客、微博上，微信朋友圈也能发，所以现在也成了一个大大家所争论的“人人皆诗人”时代。

### Talk 3:

朱学东：“抄诗”不是安慰，而是信仰。

我从80年代起就抄诗，当时没有计算机，没有打字机，我就给人抄字挣钱，最多的时候一天抄一万七千字，挣17块钱。慢慢就养成了抄字的习惯，但抄字的生意并不总有，所以偶尔会抄一两首诗，以外国的诗居多，觉得挺有意思，但我从没冒出过成为诗人的想法。

电脑普及以后，这手抄字的本领就废掉了。我觉得需要做些改变，就开始抄《诗经》找感觉。抄完一看，字怎么这么差，这是我写的字吗？不可能！我那个时候的写字还挺自傲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没耐心了，想要别人鼓励，又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太差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013年我做杂志失败，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挑战。我曾经梦想要做一本中国最好的杂志，还花了朋友很多钱来做，到头来无法向自己交代，无法向投资者交代，无法向所有人交代。这是最痛苦

的时候，又不能跟家里人讲，于是就重新开始抄《诗经》。每天抄完以后，不管字有多丑，都拍一张照片发在微博上。有很多人批评，这么丑的字还拿出来显摆？他不知道，我就是想让所有的朋友们见证我每天都在坚持。

2014年，我抄了将近一千首，2015年的目标是抄不低于一千首。事实上我一天抄三首，早上一首，晚上两首，早上自己选择，晚上按顺序抄。每天早上选诗的工夫比抄的时间还长。抄一页最多八分钟，四百字，但是选一首诗的工夫就要长很多。曾经有两个出版社找我，说要给我出一本手抄诗选，觉得我抄诗的眼光还可以。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些工作看似无用，却有益于我们精神上、人格上的涵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所有我们看过的诗歌，都背负我们精神的价值。读诗也好，抄诗也好，都是人生的自我追求。看起来没有用，但是成全了我们自己。抄诗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安慰，它是一种信仰。

### Talk 4:

苏小和：熊培云的诗歌指向一个终极的意义——自由

中国的诗歌非常缤纷，“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写法都有。但是从80年代新诗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开始，直到今天，它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80年代有两大文化事件开一时之风气，一是朦胧诗的出现；二是解放思想、新思潮的发展。80年代的诗歌是使命写作。美学家李泽厚和北大的诗歌评论家谢冕，力推青年人写作一种完全不同于“文革”时代、也不同于“四五运动”时代的诗歌，一种具备抒情气质、充满使命感的诗歌。

90年代诗歌没落，但使命写作仍在，并很快转移到所谓的后现代写作。我认为熊老师的诗歌是对80年代使命写作的回归，跟他的学术著作同根同源，只不过这种学术使命感转换成为了一种泛诗歌的方式。因此，熊老师的诗歌应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一点点影响。

我们能发现很多种写法，譬如这几天非常火的余秀华，据说两家出版社都要出她的诗集，还有诗人沈浩波跟她意见相左。赵丽华的梨花体我们也不陌生。还有当年一些写诗的人，像伊莎，韩东，他们有重要的一个旗帜，就是要超越北岛那代诗人，真正回到诗歌本身。

诗歌看似简单，但诗歌的写作却有着极高的门槛，需要语言的训练和自觉。

余秀华的诗品出来以后很多人说好。她好不好？我觉得是很好，但是不能代表中国诗歌的现状。诗歌写作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一个好诗人一定是善于创新的。比如李白的诗，好就好在他在语言层面有前所未有的创新，比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个时代的诗歌本应该是非常规整的，五言七言，合辙押韵，但是突然冒出一个姓李的人写这样完全没有章法的诗。这就是新意。

沈浩波那代人所谓的下半身创作，说明这么多年以来每个人都被一种道德上的枷锁所桎梏。所以通过身体语言来形成一种时代的张力，用诗歌的形式表现。而赵丽华的梨花体，实际上是废话式写作，用口语化的写作让诗歌回到当下，就如同“五四”的白话运动，胡适的《尝试集》，是那个时代的创新。赵丽华非常自信，也非常骄傲，从来不会因为有人骂她而觉得自己的诗歌不好。她是一个真正具有书卷气质的诗人，非常善于抒情。她愿意把传统的抒情方式搁置一旁，实验口语式写作，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诗歌一定要先锋，一定要实验。

熊老师的诗歌，指向的是一个终极的意义——自由，就像他的另外一本书《自由在何处》。他在诗歌中深入地思

考人的意义，有大量关于信仰的思考，会对引用的西方文化、传统和美学概念做注释，这是 80 年代那一代人所没有呈现的诗歌的风景。这种写法在启蒙时代的欧洲非常流行，比如我非常喜欢的艾略特，就是一边写诗一边注释的。熊培

云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诗人，他曾经留学欧洲，在使命和意义方面都有所创新，我觉得他更有意境。

来源：凤凰读书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好文共赏

### 林建华：北大教育发展之路

编者按：教育承载希望、教育点燃梦想。教育不仅是教育管理者的事，更与师生紧密相关。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更需要师生一体、关注需求、协作创新。本文根据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12月3日在学校与师生交流活动的讲话整理而得，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共同思考、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

#### 一、中国大学的过去

西方国家的大学最早起源于教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各个国家的大学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德国是最早把研究学术作为大学使命的，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始于19世纪末和上世纪初，同时中国现代大学开始起步。1952年以前的中国大学多为综合性大学，文理科为基础，同时有工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等专业学院。当时的大学规模都不大，是典型的精英和富有阶层的教育。由于信息不通畅，图书条件也比较差，当然学术的发展和竞争也不似今天这样激烈，教师的水准和对前沿领域的把握就显得非常重要。北大、清华、中央大学

和浙江大学被认为是最好的国立大学，而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是最好的教会大学。北大早期的教育受德国的影响比较大，蔡元培校长特别强调大学应当研究高深之学问，他还主张沟通文理，提倡“五育”。尽管当时对学生的专业知识的系统性还是有严格要求的，但学校规模不大，师生交流比较多，关系也比较密切，学生能够得到学科综合的教育体验。在某种意义上讲，北大当时的教育可以认为是一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教育模式。燕京大学是合并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而建立起来的，最初曾叫北京大学，后来改名。燕京大学采用美国博雅教育模式、兼收中西方文化精髓，主张除了学习西方经典，也要重视中国和东方经典方面的教育。燕京大学非常著名的办学理念“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至今依然流传人间，启迪世人。

建国后北京大学的教育发展，开始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高等教育，国家在1952年开始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逐步形成了以专科大学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当时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学科基础和实践能力，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很快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为此，本科学制曾一度从四年延长到六年。当时的北大的学科主要有“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外考”等，相当于现在的文理学院，后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逐步建立了核科学技术、计算机，还重建了一些应用类学科。当时国家把学术研究规划给了科学院，大学主要承担培养人的任务，从现在的标准看，当时的北大是一所教学型的大学，只有部分教师从事学术研究。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中国大学基本沿用了原来的教育模式。到了八十年代，北大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十六字方针，由于当时毕业生仍然是国家分配工作，十六字方针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人才；“加强基础”主要是指加强专业基础，为此建立了文理科实验班，希望理科的学生打好数理化基础，文科学生打好文史哲基础，主干基础课体系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淡化专业”主要针对过去建

立在二级学科基础上的培养方案太专太细，需要拓宽学生的专业背景；“因材施教”主要是希望通过加强对优秀学生的指导，培养学术精英；“分流培养”主要是指高年级学生选择自己的工作方向。九十年代，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不再给毕业生分配工作，基础学科受到了很大冲击；这期间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大的改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北大百年校庆为标志，开始了新一轮教育改革。当时，北大对世界主要大学的本科教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科战略研究小组借鉴哈佛的模式，提出应当在全校范围内实施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实行完全的学分制。当时校方比较慎重，决定建立元培计划实验班，先小规模试行，积累经验后再在全校推广。与此同时，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按大类招生和培养；加强通识教育，建立通选课体系；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减少专业必修学时；开设第二学位，实施更灵活的转系转专业制度；推进多样化专业教育体系建设和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小班教学，增加探索性的实验与实践，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等。这些措施对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以院系

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林建华作“通识教育大讲堂”系列讲座首讲  
二、对现状的分析与反思

大学教育的一个疑虑是规模，人们认为现在学生的规模比较大，是否还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个性化培养？一些人甚至认为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是否有必要提供个性教育？北大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使他们发现和发展自己天性，在各个领域成为引领未来的人，是我们应当担负的责任。从规模上看，北大的本科生的确比美国的博雅学院和研究型私立大学多，但远小于美国州立大学，与剑桥、牛津和南加州等私立大学的规模相当，因此，我们是有可能提供很好的个性化教育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因素不应忽略，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规模。近年来，北大的学术研究水平提

升很快，学术研究与交流非常活跃，前沿和交叉学科的布局已初步形成，另外，北大博士研究生的规模已接近八千人，他们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也是指导本科生个人发展的有生力量。所有这些为本科生找到自己的志趣、进行探索性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本科教育依然是以院系为基础、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这种专业教育是以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本线索的教育，比较注重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可以讲是一种标准化的教育，注重严谨审慎、精益求精，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医生或一些领域的工程师等专门人才的培养。从教学方式上看，目前还是以教师和课堂为中心，重知识讲授，师生互动和启发相对缺乏。为加强通识教育，我们建立了通选课体系，但整体看，现在的通选课对拓展学生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个人素质培养、价值观养成等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北大学生参与教师科学研究的状况比较好，很多学生受到很好的科研训练，一些毕业生在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和成就卓著，当然这只是专业学生中的少数。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尽管我们对自己的专业教育批评很多，但北大专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跨领域成功的例子却不少，有

一些在学界、商界、政界的成功人士，所从事的行业似乎与所学的专业并无关联。这当然与北大自由和包容的文化有关，与北大人天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关，但事实上，从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学到的思想、方法和技能，对人的素养、能力和价值观的养成都是有益的，我们希望这种转变和感悟能够发生在更多人身上。

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学生也在变化。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以往，知识和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占据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快速进步、信息的传递和流动加快，这都使人才竞争、产业分工越来越全球化；环境、能源、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全球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以往，我们的国力迅速增强，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科技竞争力和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但中国的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我们的政治、文化等软实力亟待加强，经济和社会面临艰难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繁重。现在的学生也不同以往，他们是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获取知识的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繁杂多元的社会思潮、单一和带有功利色彩的应试教育，给年轻一代的社会观念、价值观和人生

观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所有这些都对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过去。

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并回答：一是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大学教育当然要使 学生获得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应当使学生永远保持信心、好奇、激情和进取精神，而且比较而言，后者更加重要。二是我们需要彻底放弃专业教育，完全实施博雅教育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任何教育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产生发展的，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但更要根据中国实际。美国的博雅教育的核心内涵和精髓，是努力使学生个性和潜力充分展现出来，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但我们不应轻言放弃专业教育，北大多年形成的基础扎实、严谨求实的专业教育传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但我们必须要改变单纯以专业知识传授为本的狭隘观念，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体验，实现他们志趣和理想。三是研究型大学可以给予学生什么？研究型大学是探索和发现的场所，可以给予学生更加卓越和综合的个人素质，使他们掌握探索性学习的能力，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发现问题；研究型大学可以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广泛

的交流和协作，我们要训练学生必需的口头和书面交流技能，锻炼他们协作能力，这都是未来最重要素质和能力；研究型大学强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和丰富的校园文化，为提升学生的艺术和人文素养、跨文化思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校园内，学生可以与不同背景、文化、经历的人一起学习和交流，聆听和体会学者和大师的心得和智慧，实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拥有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为未来美好生活和伟大创造做好准备；让学生体验研究型大学丰富的学科和内涵，帮助他们找到未来发展的起点，更是研究型大学与众不同的之处，学生可以利用大学一流设施——包括实验室、图书馆、工作室、计算机系统、演艺厅等进行科学研究，可以与最优秀的学者一起探索未知，可以与不同背景的同学共同生活，一起探求真理、探讨人生；这些经历都将为他们的未来做好认真的和全面的准备，这些经历会使学生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和探究动力，提高应对未来更大挑战的信心和能力。

### 三、探索未来之路

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地停留在过去，也不要一味的去模仿美国的博雅教育，我们要走出一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从北大教育改革

发展看，元培学院是一种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尽管在院系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条件下，元培教育的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但他们在自由选课选专业、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开展通识教育等方面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他们为北大未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我们应当在全校范围内推进本科教育改革，要充分发挥北大强大的学术研究力量，使本科生教育成为一个“师生共同探索、发现和创造之旅”，使他们能够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富于想像、热情洋溢的创造力。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对社会的认识能不能从日常经验常识提升到理性反思的高度。真正认识现代社会，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专业精神是一种人生态度，严谨审慎、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协作共赢。学生在专业学习和探索中，学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合作，从而体会人生的真谛。

通识教育是北大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识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能够“懂得社会、懂得自己、懂得中国、懂得世界”。要使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切伟大创造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完成的，我们心灵深处都孕育着对美好生活和使社



会进步的期盼，只有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我们要启迪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使他们都能够认识自己，理解生命的意义，做出符合自己天性的选择，找到发自内心热爱并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我们还要让学生真正懂得中国，认识和理解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古典文明、近代现代传统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将思政课纳入到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范畴内，通过经典阅读、小班讨论、反思性思维训练，真正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不盲目模仿西方，建立理论自信、走一条中国之路。我们也要让学生真正懂得世界，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其他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了解现实存在的世界，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了解世界格局，了解为什么世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专业教育体系建设是北大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专业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调动院系和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让学生体验到研究型大学丰富的学科内涵和创造氛围，使他们能够始终保持好奇、自信和进取精神。第一，我们的教育应当充分展现研究型大学的丰富、多元、规模和广阔，应当是以发现和探究为中心，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共同探

索的教学模式。我们的专业教育是以院系为基础组织的，这对学生跨学科学习和体验大学内涵是不利的。我们应当建立更加灵活的教学管理体系，实现学部内学生自由选课和选择专业，各专业应当明确毕业的最低专业课程要求，要建立更多的第二主修和辅修专业，鼓励在学部层面组织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鼓励学生跨学部选课和学习。第二，要特别关注新生，为他们开设更多的研讨课程，特别要鼓励不同学科的教师联合为低年级开设前沿和跨学科的课程，激发他们内在的创造潜力；著名的教授们要以为本科生上课为荣，教师高水准的研究不仅会使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学生的激情也会使教师更加焕发学术的创造力；要让学生尽可能了解和探索不同的专业领域，探索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要让学生尽早参与到学术研究活动中，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学会独立思考，体会创造的乐趣。第三，要在课程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本科生教育一定要使学生获得过硬的交流与沟通技能，要让学生学会如何有效地通过书面和口头方式阐述他们的研究和学习成果，要知道，一个观点只有在能够交流的基础上才算是完全确立起来，写作和

口头表达都是彻底理解资料的思维过程，未来写作不是给教授们看的，而是写给其他读者的，这要求分析的技能、对复杂材料的透彻解释、简洁性、清晰性，这应该是对每一门课程中交流沟通技能要求的标志。第四，创造性地运用信息技术，必须适应学生的学习方式，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一代人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生活在网上，学习在网上，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必须适应他们学习方式的变化。现在信息技术使人们在网上远程交流互动，这使身处遥远国度的人们可以在一个课堂中学习。我们鼓励教师开展“翻转课堂”，让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课程的基本要求，课堂教学的重点应当放在研讨和探究问题上；我们也鼓励跨区域跨国度的教学，让更多优秀的、不同背景的学生一起学习，

一起研究问题；我们还应当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网上交流讨论，形成更加活跃的网上学习环境。

总之，北大应充分认识到本科教育危险与机遇并存。我们既不能以一种自满、不变、健忘的方式，自说自话、自行其是，也不能盲目地接受国外博雅学院本科生教育模式。**我们必须探索“适应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充分发挥研究优势的本科教育模式”**。本科教育变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使本科生更加得益于研究型大学独一无二的机会和资源，给予学生独特和有价值的研究经历和生命体验，使他们为丰富多彩的未来做好准备。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史苑钩沉

###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编者按：现在，不知在图书馆复习备战期末的同学是否已经被暖气热得脱下厚重的外套，但当年“屋里仅有一个小火炉，炉内的碎煤常常仅是闪烁着微弱的青蓝光的火苗，可以看得出它的温度决不能抵御那外面的零度以下的气候的寒冷。有时候飕飕的大风可以把这间屋子的木门吹开，并且把里面的零乱的报纸吹个满地。但是，读报的人却都有着一颗诚挚而又热烈的爱国的心。”今天的图书馆条件远胜往昔，但读者能否依旧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值得令人留恋的地方，就是说值得令人心醉，也不能算是过分。本来，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它的图书馆的，虽然那些图书馆的真实的情形，不但是在内质上，就是在形式上，也有绝大的异点或差别，其不同的程度有时候简直不容易叫人相信，虽然我不想说是不能叫人相信。

在战事爆发之前——注意，在战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参观了几个相当著名的大学的图书馆。一

个是南京的中央大学的图书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馆内的阅书的学生很多，但是，不在阅读课内的功课或温书的学生太少了。这就是说，大部分的学生都在低着头研求着当天或第二天的指定课程，准备应付教员的 Quiz 或 Test，肯自己在一旁静悄悄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究竟很少。这样的情形，北平西郊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用功的学生们，也未能免。在清华，进图书馆看书是有一个专门的名辞叫做“开矿”的，开矿的目的，大半是想得到教授的好分数，在校内是有许多人以得到各项功课的金齿耙“E”或银麻花“S”为荣的。我在这里只举这两个好一点的例子，应该可以初刊时，概括其余的情形。因为，倘若说起一些在其他的几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更常见到的现象，那么，也有借它来做男女学生的谈恋爱的幽静场合，也有用它做为解闷休息的清涼境界，甚至于在图书馆里开开什么江苏省同乡会，借那长长的书桌来摆起藉以联欢的茶

点，喷起一圈圈的烟雾来，这也是题内应有，并没有什么希奇。

如果有的学校的学生们走进图书馆是为了吃茶点的，则北大的学生们走进北大的图书馆是为了吃他们的精神上的食粮，并不能够说是过甚其辞。

北大的学生们并不是天生的超人，但是他们大约不甚重视教授们指定的功课。原因是教授们自己也不重视，有的教授甚至于平素并没有什么功课指定。譬如像沈兼士先生，在他教中国文字学的时候，一年到尾仅讲完那七十多页的讲义式的薄薄的课本。在他的重覆了近百次的语句里面，《景紫堂丛书》，《一切经音义》，《灵鹫阁丛书》……这些名字总是耳熟能详的。如果图书馆里没有这些种书籍，也就算了，但是图书馆里不但是有，而且可以随便的借，并且可以几十本一次的借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留难。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愿意去拿采翻翻的总是少数。那么，喜欢去图书馆看书或借书的人既多，图书馆的重要性也就增加，同时，教授们既然都有循循善诱的吸引学生的力量，当然不必特别画出某书第五十三至八十二页，另一书五十四至八十三页做为 Assignments 了。

北大图书馆的建筑，是在松公府的旧址。这里，我们最好是把它的新旧两部分画分开来说明。旧馆址就是胡清的松公府本身，前后占有三个大的庭院，雕梁画栋，古柏参天，非常富有中国的艺术美的气息。自然，这样旧式的建筑物，因为学校的经济拮据和喜欢保持传统的老谱起见，已经变成很陈旧很腐朽的屋宇了，虽然每天照例的有几百个年轻的男女在那里川流不息的进出。这座大府的第二进和第三进的屋子，近年有一部分装修成为很富丽堂皇的宴会厅，在平常是不大应用的。另外一部分的屋里则堆积满了整箱整柜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未经整理的藏书，实际上都和图书馆是分开的。和图书馆有关系的仅是第一进的几间，可以说完全是阅报室和它的附属的部分。同时我也可以说，这旧图书馆的整个部分，就是全部的阅报室。在我从前写的《北大和北大人》的第一篇——《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内，记得有过一张北京大学新图书馆的插图（《宇宙风乙刊》第廿七期），在新图书馆的旁边，有一座较旧的屋宇的一角，那就是旧图书馆的一部分的轮廓。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的记忆着，那阅报室的梁木上面尚未剥落的陈旧而古老的深红色的髹漆，四面交织着碧青色的云

彩和玄黄色的织锦的图案，真是一看之下就可以感觉到一阵的幽古的美丽的氣息，深深的埋藏在几重的灰尘和朽黯的底下。那交叉形的细纹的窗棱上面也垂挂着几重尘丝和并没有完全织成的蛛网，在它的下面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一屋的充满着热烈的求知欲和爱知天下事的读报的青年们，大家挤在一块儿看《大公报》上面王芸生写的《寄北方青年》的社论。

在冬天屋里仅有一个小火炉，炉内的碎煤常常仅是闪烁着微弱的青蓝光的火苗，可以看得出它的温度决不能抵御那外面的零度以下的气候的寒冷。有时候飕飕的大风可以把这间屋子的木门吹开，并且把里面的零乱的报纸吹个满地。但是，读报的人却都有着一颗诚挚而又热烈的爱国的心，这种热烈的心情使整个的屋子里充满着欢欣而活泼的朝气，在阅报室里面所读到的报纸，除了北平当天的各大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益世报》，法文的《政闻报》，英文的 Peiping Chronicle，和小型版的《实报》而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华北明星日报》等，都可当天看到，此外像上海，南京，汉口各大城市的报纸，也不过隔几天就可以寄

来。在当时，北大的师生们曾经合办过一个《读书周刊》（天津《益世报》）一个文史周刊（南京《中央日报》），都不是在北平出版的。甚至于像边疆各地的报纸，如迪化的《新疆日报》等，也都按期收到陈列，看的人也很多。在大阅报室的东侧，有一排偏殿式的厢房，则是存贮多少年来的旧报纸的地方。各地各种的合订本的报纸，都分别年月的装订起来，随时可以查阅，毫不困难。管理的人员虽然仅有一个，却非常熟谙迅速。事实上这一个人并不是从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或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修学校毕业的，看上去好像有点儿不够资格，但实际上他的技术训练却早已超过任何常人之上。他担任他的职务已经在二十年以上，二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使他的管理方法和整理步骤都能够丝毫不紊乱的迅速办妥，没有一位教授或学生不感觉到满意。他甚至于可以认识借书人的姓名职务和面貌，只要他看见过这个人一次。因此，他可以几大册的合订本的旧报纸借给一个空手的学生，用不着一看或问询他的有无借书证。他不是职业的图书馆员，他在校内的正式的名称只是一个工友，而且他每月所得的薪金，也和其他的看门扫地擦黑板锁课堂的工友们并无分别。他和职业的图书馆

员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一天到晚喜欢翻看旧报的内容，谈论十年来的国内外的各方面的变迁。职业的图书馆员则仅知道说“查不着”“借出了”“正在催还”，并且重复着他的说话的次数而已。

以上所说是旧图书馆的大概，而新图书馆就在旧馆之西，是三层大楼的极新式的建筑，这才是图书馆的本身。这一座新图书馆在民国廿四年秋才落成，那年的双十节还举行过一次开幕典礼，但是两年之后，随着卢沟桥畔的神圣的抗战的炮火，北大由北平而迁至湘南，昆明，叙永，这座巍然独特的图书馆，则至今沉沦在北平市内含垢纳辱，真是像宋人词里所说的“弦歌地，亦膾腥”了。

新图书馆可以分做前后两部，前部是三层大楼，楼下是中西文参考书阅览室，共两大间，二楼是中西文杂志阅览室和指定参考书阅览室，也是两间，三楼是几间办公室编目室等。

每一间阅览室的面积都是很大的，大约像其他学校的礼堂饭堂那样。三面都是极高的长窗，配着深绿布做的窗帘，简洁而且悦目。壁间满列着几大排的书橱，里面都是分门别类的新出版的参考书籍，时常更换陈列。在新书购到编目陈列之后，两个星期之内仅能在馆借阅，

以供众览；两星期后就可以随便借出。善本的书籍和精藏的方志等书，另有善本藏书目或方志藏书目备检，也是随时可以借阅。譬如说，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上面多仅有一两段的关于《金瓶梅》的叙述，大部分是抄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多很简括，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却可以随便的在图书馆里借阅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并且把它和坊间各本详细比较，钞成“补遗”。

每一间阅览室至少有十张极长极大的书桌，每桌可宽坐至少八人，而座椅的舒适，又为全校任何他处的椅子所不及。室内在夏天虽无冷气，自然生风，冬季则有热水汀暖气，和室外的温度相差奚止数倍。靠在图书馆的座椅上，一眼望去，一排一排的书架，灿烂夺目，加以室内阅书的同学很多，却大家都静悄悄的，别有一番读书乐的印象。《天下郡国利病书》，《太平御览》，廿五史，《碑传集》等都是唾手可得，俯拾即是的东西，用不着费心，常常可以很容易的放在面前。如果不是怕书里的蠹虫咬手的人，随便翻翻总是不成问题的。

作者：柳存仁

文章来源：《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陈平原，谢泳等著

编辑：赵晗荻

# ■ 大美北大

## 燕园 雪中

——燕园随手拍 冰雪未名话题（来源于未名 BBS 微博）







## 学员心声

### 北大国培，走过何曾离开

在北大国培班的短短十天里，我像一头饱受饥荒的牛撒在一片肥美的大草原，只顾将大把大把的青草一古脑儿向肚里裹。

离开北大的日子里，我挺着鼓囊囊的肚子，一直想寻求阳光照耀下的一段墙根，静静地卧下来有滋有味地反刍反刍。

然而，一回到单位，套绳就又挂在肩上，伴着咯吱咯吱的响声，我习惯性地迈起双腿，像蒙上了眼罩一路前行。

两个记录满满的笔记本在桌子上放着，时不时翻一翻，那是一种回归青春的恋爱，那是一段浪漫而神奇的精神之旅，那是一场洒落心头的花瓣雨……

语文教师要当读书的种子，把培养学生读书兴趣作为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不能只强调精读，还要连滚带爬地读，泛泛地读。读书杂的学生才有后劲，会考试而不会读书的学生，最后是很难冲上去的……温儒敏教授

温温尔雅的大儒风范，是一张网网住了我的一往情深。他娓娓道来，不急不缓，却如一声声惊雷在我的心际炸响。

我们要给学生引向哪里？是让他们看得见绿水青山，看得见白云蓝天，看得见碧草小溪，看得见雪域高原……还是让他们在有限的文本中打圈圈，在狭小的教室里戴着镣铐跳舞，在一勺勺地硬塞中败坏他们的口味？如果向导迷失了方向，那么我们身后的那群人，是不是要面临一场万劫难复的深渊？

那是一张照片，温家宝总理视察北京皇城根小学时，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一个镜头。画面里除了温总理，还有五六个埋头读书的孩子。盯着这个定格画面，心头开始滴血……六个孩子至少有三个戴着深度近视镜，六个孩子无一例外地佝偻着身子，唯有两鬓霜染的温总理身端气正神闲。又是一张照片，周恩来总理 1945 年去重庆谈判时，身穿毛呢大衣，头戴礼

帽缓缓走向人群。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人民尊敬你，敌人害怕你”；这就是我们的总理，轩昂的气度，大家的风范。难道总理自有吉相不成？

让我们走进这两位共和国总理的母校，去看一看南开中学的衣镜铭吧——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扣，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是张伯苓、严修主校期间为了培养和规范学生的仪表和举止而在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刻写的箴言，它也成了“南开精神”的一部分。难怪当时有人评论“南开学校乃一极有精神之学校……学生均甚活泼而眉宇间有一种文雅之态度”。

这几幅画面，这一番话语，其实只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任志喻校长给我们讲课前的简单导入。我不想再去写他的课给了我们什么教益，因为这就足以让我们如五雷轰顶般的震撼。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的语文教师又应该做些什么？难道我们整日忙忙碌碌，就是要把一个个富有天性的孩子培养成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子东倒西歪的人吗？

教育做不好，民族的未来又在哪儿？是谁说过，一个民族没有科学技

术，一打就垮；没有精神和文化，不打自垮。挺起腰杆吧，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行，我们不卑微，亦不平凡。用心智和汗水把共和国的大厦筑得更牢更坚，有你，有我，有他。

“语文教师在学生面前应该始终是最语文的。”当首都师范大学张彬福教授说出这句相当拗口的话时，我的思维一下子短路了。继而，我陷入对自己语文教学生活的回忆。那是 20 多年前的一节语文课，我让随利芳同学站起来朗读《白杨礼赞》，当她将要读到“难道你就只觉得它只是树？”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悄悄走到她身边，与她同时朗读起来，我生怕我的加入让她楞住，不曾想她瞬时亢奋起来。当我们读完后，教室内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那一刻的默契，是文本与生本的交融，是师生心灵的相通；那一刻的气场，是我在语文，语文在我。

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朗读给同学们，或者把我的手稿、剪报等，作为对他们的奖励，我的文章和学生们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学生们写作简直达到走火入魔的境地。此般感受激发我写了一篇文章《老师下了水，学生才会水》，一投出去马

上就被《作文指导报》刊发出来。这也许正是张彬福教授所言，你想让学生成为什么样子，自己要先做出个样子。

是啊，做一名能帮学生解疑的语文教师，不难；做一名能成为学生示范的语文教师，不易；做一名能形成学生人格的语文教师，优秀。我只是无意识地在做着学生的示范，而这距离一个优秀语文教师的路子还有多远呀！

很感谢国培班安排的最后一节课，那是清华大学附中王君老师的《一路修行做老师》。我们在感染着她的激情，接纳着她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在观照内心，躬身自省，否定批判。我曾经多么欣然和自豪，课堂上给孩子们呈现的诗一样的美学意境，以及最后那画龙点睛般的哲理迸发。但拿王君老师的“本真语文”来看，这样的课堂看似热闹唯美，其实太过于浮

华肤浅，因为我教给孩子们干货、硬货、实货、真货的东西真是太少了。

若不是这次国培班的及时纠偏，我是不是会像没有穿衣服的“皇帝”那样，如跳梁小丑般继续炫耀这世上最华美的衣服？教育是一个不完美的人，领着一群不完美的人，走向完美的过程。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一路修行做教师，一路修行教语文。在这条路上，我，以及我们每个人，都怕要穷其一生。

不去说北大那未名湖畔宜聆听，博雅塔下好读书的文化氛围；亦不去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擦肩而过的同学情谊，只说在 314 电教室里那一餐餐文化盛宴，都够我们一辈子去仔细咀嚼！

作者：薛志民

河南汝州